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论新加坡街名及其译名的历时演变

A Study of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and Their Transliterations

Submitted by: 陈秀君

Chin Siew Chien (088180C12)

**A Final Year Project submitted to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in Chinese**

Year of Publication: 2011

感谢

在此衷心感谢论文指导老师高虹副教授在本论文撰写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与鼓励。另外，也感谢默默支持我的家人。

Acknowledgement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sincere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Helena Gao, for her guidance and encouragemen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is thesis. Also,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family for their support.

目录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2-5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5-6
第二章 街道称谓的发展概述	7
第一节 异同族群下的多元俗称	7-9
第二节 街名及华文译名标准化	9-10
第三节 街名录的版本	10-11
第三章 “马来文”街道的变迁消长及街名特色	12
第一节 开埠初期与城市计划下的沿海街道	12-13
第二节 自治独立前后“马来西亚化”意识的多类街道	14-15
第四章 70年代前、后阶段“马来文—华文”街名及译名的演变	16
第一节 语音	16
一 地域方言向普通话汉语拼音作注音靠拢	16-19
二 音节到音位为注音单位的倾向	20-22
第二节 书写形式	22
一 修订方言字与地域字	22-25
二 往简易字体的形式发展	25-28
三 选用正面或中性色彩的文字	28-31
第三节 语文结构	31
一 从萌芽到自觉奠定的意译发展	31-35
二 纯马来文的单语或双语到双语或多语混用模式的转变	35-41
三 译名间同音同字或音近同字的规律化	41-45
小结	45-46
第五章 结语	47

第一节 21 世纪街名与译名的趋势推测	47-48
第二节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48-49
附录（一）：表 1、新加坡马来文地名的地理分布区	50
图 1、新加坡地理分布图	50
附录（二）：表 2、音位注音的用字修订（从《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及《星马通鉴》到《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2010]）	51-52
附录（三）：表 3、2010 年街道译名的通译汉字	53-54
附录（四）：表 4、21 世纪新启用或拟建中的地铁站名	55-56
参考书目	57-60

摘要

街名及其译名不仅是指涉街道的单位，也是历史渊源及文化背景的定位。在新加坡街名更反映到多语环境下，翻译结构及语言符号的确立及发展。本文尝试总结马来文—华文街名和译名的发展概况、马来文街道的变迁消长及街名特色。另外，本文以《新加坡街道指南》和相关街名录所罗列的中巫对照街名及译名为准，以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1970年代前、后二阶段马来文—华文街名及译名的演变。通过语音、书写形式与语文结构三方面的分析，探讨注音现象、通译字词的选用、意译结构、语文混用的模式及译名的规律关系，借以梳理本土性的语言背景，掌握语言文化的发展脉络，作为本土研究中多一项学术的积累。笼统来说，1970年后的街名及译名普遍是以汉语拼音及音位为注音单位、修订方言字与地域字、选用简易字及较正面或中性色彩的通译字词，并采用相对自觉的意译形式、双语或多语混用的模式和译名间同音同字或音近同字的规律结构。

Abstract

Street names and their transliterations do not only refer to streets and roads, but also reflect their histories and cultural contexts. Moreover, street names in Singapore establish and develop the translation structures and linguistic symbols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This thesis trie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alay-Mandarin*” street names and their transliterations, the changes of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Malay*” stree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mong all “*Malay*” street nam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ditions of “*Singapore Street Directory*” before and after 1970,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Malay-Mandarin*” street names and their transliterations by analyzing the phonetic notations, selec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ion structures, features of code-mixing, and also relationships of regular patterns among all transliteration names. As addition to the native place studies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generalize the background of aboriginality language and grasp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ultural language.

第一章：绪言

第一节：研究动机

街道是城市内部划分的基本单位。由此，街名不仅起到辅助公共建设、交通运输、税收和邮政服务定位的功能，¹也负载承传了一个社会城市的发展史与文化演变，即兼任了书写历时进程的媒介。因此随着条条街道逐步被划定，街名已不再是狭义地一条从街头到街尾范围内的称谓，而是不成文地在定位着各条街道的命名由来，也是对本土的历史背景、传说故事、社会风貌、乃至伫立当地的建筑物或地标景观的指称；甚是广义到破解多元社会下的语码翻译，比如，A语言中的街名转译成B语言时所用的语言符号，如音译法、半音半意法、直译法、意译法等都表现出了A语言和B语言的语言特征和文化负载。然而，街道命名或翻译在因时、因地、因人各异的前提下可能出现程度大小的差别，笼统来说也反映出官方与非官方单位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制定准绳或内在主导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与语言态度。²

历来不少学者出书专研或在报章评论上概括了街道的文化渊源或街名由来；但基于历史久远，难以考证，奈何存有迷思，以致罕见有学者再提出新意，大体上是一翻再翻。而有关街道中文译名的翻译问题，不论是译音用字或新旧译名的更易、译名标准或统一现象，则少有学者撰文分析或探讨。比对之下，它被忽视的情况是让人感到费解的。若说街道命名倾向以文字记录地方历史的时序轨迹，街名翻译则侧重在梳理本土性的语言背景，总结语言文化的演变与发展。本文的撰写目的即此，以《新加坡街道指南》和相关的街名录所收之街名及译名为准，尝试梳理早期迄今“马来文—华文”街名及译名的更动变迁，发展轨迹及今昔演变，作为日后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上的参考。

¹许永顺《大坡街道华文名称探索》，见《记得，大坡牛车水》，（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厅，2002），页17。

²官方单位是经由政府所组的“华文街名标准化委员会”，并展开第一次街道华文译名标准化的审核工作，而非官方单位则由私人界翻译学者自组，且自行编著中西或中巫对照的街名录，以应官方街名与华文译名划一的需要。

第二节：文献综述

历来对新加坡街道的研究大略把焦点放在（一）命名由来与（二）华文俗名两方面的探讨中，反之对街道的变迁消长、街名更动、街名结构与归类及华文译名的问题则较少被提出讨论，一般是以报章评论、书籍序文或论文研究中某章节的形式作出归纳或论述己见。下文对这几方面的课题研究作简要的概括说明。

从档案局的史料纪录或依循前人的考证所得，³可以搜寻不少有关街名溯源的资料，却不曾归纳整理，汇集成书，以致非常零散。学者 Savege & Yeoh (2003) 的“*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算是首部对新加坡所有官方街名的溯源作了相当完善的史料整理、归纳汇集的著作；⁴而吴彦鸿的《新加坡街名由来》（2006）及后来的增订本（2008）乍如 Savege & Yeoh 研究的中文版，收入了街名的命名由来，并讲述街道的文化特色。⁵除外，不少著作从街道发展史及社会风貌两层概括了建国前后某地方区域的老街，主要是对该条街道的地标及建筑物、街名由来、当地野史或俗称作笼统论述；如：王振春的《石叻老街——根的系列》（1997）、⁶吴彦鸿的《新加坡风土志》（1998）、⁷韩山元的《从大坡到小坡——新加坡市区掌故》（2004）、⁸区如柏的《寸寸乡土情》（2006）、⁹许永顺的《新马街名地名探索》（2009）¹⁰等著作皆针对几条官方街道作选择性地介绍。而发表在报章上关乎街道取名

³开埠前或英殖民时期，由 E. G. de Eredia's (1604)、Franklin & Jackson (1822)、G. D. Coleman (1836)、J. T. Thomson (1842) 等者所绘制的新加坡地图是搜集街道命名由来的可靠资料。不少学者也撰文讲述了华文俗称街名或官方街名的来由，如黄尧的《白头老客话街名》、许云樵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街名拊掌录》等著作或报刊发表的《新加坡街名俗名考》、《新加坡街名沿革考》等篇章。

⁴Savage, Victor.R & Brenda S.A. Yeoh,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⁵吴彦鸿《新加坡街名由来》，（新加坡：宏砚工作厅，2006 及 2008）。

⁶王振春《石叻老街》，（新加坡：胜友书局，1997）。

⁷吴彦鸿《新加坡风土志》，（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7）。

⁸韩山元《从大坡到小坡——新加坡市区掌故》，（新加坡：八方文化，2004）。

⁹区如柏《寸寸乡土情》，（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¹⁰许永顺《新马街名地名探索》，（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厅，2009）。

来源的文章计有莫美颜的《缅甸古都江河名留摩绵、摩绵区有 15 缅甸名街道》（2002）、¹¹蔡孝欣的《新街道命名更重视历史》、《新镇街名从何来？》（2003）、¹²林道生的《（小坡）七条马路的故事》（2003）、¹³谢燕燕的《穿街走巷、大小通‘知’、全岛 2400 多条路、街名背后有趣事》、《大诗人比比街是》（2006）¹⁴等篇章。

在华人俗名的研究上，有学者扼要概述了俗名的取名溯源及文化背景：有 Houghton 的“*Native Names of Streets in Singapore*”（1891），罗列了 105 条英文街名的华文俗称及由来。¹⁵鲁白野的《星洲的街名》（1953）以散文体记叙了各籍贯华侨有自拟街道俗名的习惯，以几条同时具有多种俗名的街道为例，¹⁶黄尧《星马华人志》的一篇〈白头老客话街名〉（2003）较全面地概括约 100 条以华人先驱为名的街道与华人自拟俗名的街道；¹⁷许永顺的《大坡街道华文名称探索》（2002）¹⁸和王振春的《小坡老街的别名》（2005）¹⁹分别简介了大坡和小坡范围内的街道俗名。肃明的《新加坡街道的华人名称》（1960）、²⁰姜道章的《新加坡之华文地名》（1968）²¹和叶勤生的

¹¹莫美颜《缅甸古都江河名留摩绵、摩绵区有 15 缅甸名街道》，见《联合早报. 现在》（新加坡），2002 年 5 月 21 日。

¹²蔡孝欣《新街道命名更重视历史》、《新镇街名从何来？》，见《联合早报》（新加坡），2003 年 5 月 16 日。

¹³林道生《（小坡）七条马路的故事》，见《新明日报. 新专题》（新加坡），2003 年 7 月 21 日。

¹⁴谢燕燕《穿街走巷、大小通‘知’、全岛 2400 多条路、街名背后有趣事》、《大诗人比比街是》，见《新明日报》（新加坡），2006 年 8 月 19 日及 2006 年 8 月 24 日。

¹⁵ H.T. Haughton, “Native Names of Street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06 (1891): 49-65.

¹⁶鲁白野《星洲的街名》，见《狮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3），页 125。

¹⁷黄尧《白头老客话街名》，见《星. 马华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会及马来西亚黄氏联合总会联合出版，2003），页 213-217。

¹⁸许永顺《大坡街道华文名称探索》，见《记得，大坡牛车水》，（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室，2002）。

¹⁹王振春《小坡老街的别名》，见《记忆里的小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

²⁰肃明《新加坡街道的华人名称》，见《南洋文摘》，第 1 卷，第 11 期（1960），页 60。

²¹姜道章《新加坡之华文地名》，见《南洋大学学报》，第 2 期（1968），页 71。

《星洲通俗地名街名起源》（1969）²²等亦是这类课题研究的论文篇章。也有学者以语言学层面对街道俗名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如冯玉珊的学士论文《论早期新加坡街道华文俗名的语言与文化特点》（2004）²³及硕士论文《早期新加坡街道华文俗名的风格与修辞研究》（2005）²⁴和许永顺的《大坡街道华文名称探索》（2002）都是从语音、语法、用字或结构的角度来探讨街道俗名所反映的语言特征。唯冯氏较全面地概括了所有的街道俗名，也分析了俗名在修辞上反映的文化特点，而许氏的研究独针对大坡范围内的街道俗名。至于潘醒农的《新加坡街路俗名》（1952）²⁵和许云樵的《新加坡市街华名俗称汇录》（1961）²⁶则列出了全岛街道俗名的一览表。

尚有一些与新加坡街道相关的小类研究，如许永顺的《大坡街道华文名称探索》（2002）也探讨了大坡范围内街道易名或消长的变迁、官方街名的结构与归类及华文名称的翻译问题和许云樵的《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街名拊掌录》（2005）论述了官方街名译音用字古怪的现象，甚至对比新加坡与槟城及马六甲三地街道的华文俗名，得出不少俗称相同的结论。²⁷而李王晶莹的《为我们的街道留史》及《他们为街道留史》（2008），是作者总结了历年来与新加坡地名掌故研究有所相关的史料文献与书籍资料。²⁸

²²叶勤生《星洲通俗地名街名起源》，见《南洋文摘》，第10卷，第11期（1969），页750。

²³冯玉珊《论早期新加坡街道华文俗名的语言与文化特点》，（新加坡：新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论文），2004）。

²⁴冯玉珊《早期新加坡街道华文俗名的风格与修辞研究》，（新加坡：新跃大学（硕士班论文），2005）。

²⁵潘醒农编著《新加坡市街俗名表》，见《东南亚地名街名录》，（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2，页205至208）。

²⁶许云樵编著《新加坡市街华名俗称汇录》，见《南洋华语俚俗辞典》，（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61），页58-107。

²⁷许云樵《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街名拊掌录》，见《马来亚丛谈》，（新加坡：青年书局，1961），页193-196。

²⁸李王晶莹《为我们的街道留史》及《他们为街道留史》，见《阅读·探索》，（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8），页103-118。

综述来说，这方面研究的广度仍显不足：对新加坡街道的研究普遍侧重在历史层面的命名由来的问题上，或只局限于概括华文俗名的语言特色而已；反而忽略了官方街名（多为英语及马来语）与华文译名之间的翻译现状或语言结构，甚至是不同时期的演变现象。

第三节：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

依据最新版的《新加坡街道指南》（2010），全岛约有 3000 多条官方街道。纵观其数量庞大，而研究时间有限，故笔者惟有缩小研究范围：只挑出以马来文命名的路名，有针对性地探讨 1970 年前后马来文街名与中文译名之间易名变迁的现象。

本文所界定的马来文街名为：

- 一、街名一概以马来文命名，同时能从马来文字典里查出该字或词的定义，如 **Jalan Sempadan**。
- 二、街名的专名为马来文，通名为英文，²⁹而马来文专名同时能从马来文字典里查出该字或词的定义，如 **Warna Road**。
- 三、街名的专名为英文、方言或其他语文，通名为马来文，如 **Jalan Hok Chye**。
- 四、街名是为纪念某位马来先贤而命名的，一般不能在马来文字典里查出该字或词的定义，如 **Omar Khayyam Avenue**。
- 五、街名以马来族群的分支系属或神话传说或相关的马来文化为专名，一般不能在马来文字典里查出该字或词的定义，如 **Bugis Street**、**Bedok Road** 和 **Jalan Hajjah**。

²⁹根据许永顺的说法，街名往往是由专名(Specific Term)和通名(Generic Term)组合而成的结构。一般来说，专名表示该地的地名、历史、建筑或其他方面特征；通名表示街路名的类型及特征。如官方街名的“New Bridge Road”（新桥路），“New Bridge”（新桥）属专名；“Road”（路）属通名。参考许永顺《大坡街道华文名称探索》，页 17。

六、街名以“马来亚”³⁰的地名为名，一般不能在马来文字典里查出该字或词的定义，如 Ipoh Lane。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有三：

- 一、征引群书，吸收前人学者与此相关的研究知识，作为史料的参考依凭。
- 二、以 1970 年为界限，划分前、后二阶段，并搜集整理该年之前及之后收有中巫或中英列表的专书或街道索引。前期有《巫来油通话》（1932）、《东南亚地名街名录》（1952 与 1959）和《星马通鉴》（1959），后期则分别是 1970 年、1990 年及 2010 年版本的《新加坡街道指南》。
- 三、查阅街道命名由来的资料和马来文字典，以正确挑出符合本文界定的马来文路名；并以 1970 年的《新加坡街道指南——附中英街道索引》为基准，个别比较和分析前、后阶段“马来文—中文”的街名及译名，再梳理其在语音、书写形式及语文结构的特色及变化。

³⁰马来亚是马来西亚在独立前的称呼。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由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与海峡殖民地的檳城及马六甲所组成，共 11 个州属。1963 年 9 月 16 日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砂拉越和北婆罗州(现在的沙巴)合并成立马来西亚。1965 年新加坡独立，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参考方显编著《星马史》，（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0），页 255-279。

第二章：街道称谓的发展概述

众所周知，每条街道都会有一个特指的街名，作为指称上的方便。但是鉴于早期新加坡多元族群的社会本质，影响了街名的单一性，进而随着语文群体的分化而跟着多元起来，致使一条街道往往兼具了官方街名、自拟的俗名或中西、中巫对应翻译时多样的中文译名，毫无规律。而后期为了解决认知及邮寄辨识的困扰而逐步统一了街名与华文译名，是政府官方与社会民众各为自觉规范的产物，因而形成了迄今的一条街道配以一个官方街名及一个华文译名的现象。

第一节：异同族群下的多元俗称

学界普遍都认为，早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前就已有马来人与华人散居于岛上的记录。¹而在 1819 年新加坡被开垦后，随着英殖民地政府对庞大劳动力的需求，更是引进了大批的华南移民，开启了新加坡多元族群的新页，进而也鲜明地展示了族群性的隔阂与交融。基于生活、文化与语言上的差异，不仅是各族群，甚至是同族内部也按籍贯和方言的不同而分开居住。由于海峡殖民地统治长达一百多年，且行政方面以英语为交流媒介，这进一步加剧了语言沟通的难度。而英殖民政府一度实行的“城市计划”²，也无形地建构了某区域以一种语言或方言为主的封闭局面。比如，从牛车水一带以粤语音译的街名、直落亚逸街一带以闽语音译的街名和新巴刹街一带以潮州话音译的街名来看，我们便可知早期社会各族群与方言群体之间存在的疏离关系，也不难想象在街道的命名上，往往出现一地数名的混杂情况。除官方街名外，尚有各族人士自拟的俗称。如：

¹海峡殖民地政府旧档案中收有一条随莱佛士最初登陆新加坡之克劳福船长的日记纪录：“马来文的译文，当由苏丹的侍从秘书当场大声向围聚中的住民宣读，这些住民多是马来人和华人……”。引自黄尧《一身做了三国领事的华人》，页 175。

²1819 年 6 月，莱佛士与天猛公协定把市区分划成几个不同的区域，使各民族和各阶层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地方，并委任该区域的族长为“甲比丹”，赋予其相当程度的权力。不外乎是为扩大英殖民占领的疆地及易于管辖的目的。参考李卫国编辑《新加坡历史图片集 1819-1945》，（新加坡：星洲日报[新加坡]有限公司，1981），页 7-8。

- 一、“亚纳街”，官方街名为 Arab Street，闽侨称之为“爪哇街”，粤侨名为“賣花街”。
- 二、“中国街”，官方街名为 China Street，闽侨谓之“賭間口”，粤侨称之为“寶字場街”³。
- 三、“仰光律”，官方街名为 Rangoon Road，闽侨谓之“蓝兒巷”，马来人叫它“班蘭”⁴。

同时，随着殖民地政府在 1822 年所实施“每一条街道都必须拥有适当的名字”的法令⁵，官方由此决定以罗马拼音为统一街名。或许英、巫语文皆是罗马拼音的音系，在发音及拼写上的相似，所以不少街名是直接沿用马来族群惯用的马来文街名；相对的，极可能是对方块文字、阴阳上去声调的陌生，因此当局对街名译成汉字的需求大不重视，没有整理出一套标准的方言或中文译名来。虽然如此，鉴于沟通交际的方便，各族在“排我异者”的当儿，同步也发挥了社群互动、交流的同化能力，包括学习他族的语言。清代官员李钟钰在《新加坡风土记》就有所记载：“土人操巫来由语，通行南洋各島，华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长者，无不习之。又多習英语，同齐往来，时而巫语，时而英语，时而闽广土语……”⁶。因此掀起了华族以漳泉潮音注马来文街名的热潮，甚至出版了一些列有中西或中巫对照的街名索引的书刊来。

然而，基于少了官方程序的规范化，华族人士与书刊的华译难免不少谬误。在读音、用字或翻译的形式上全然没有一个标准。早期报章中即可发现街道华文译名的汉字选用是没有规律可言的，同是“Jalan Eunos”，写成“惹蘭有诺斯”或“惹蘭又

³本地姜《本坡街名今昔称》，见《星洲日报》（新加坡），1950年10月23日，版6。

⁴同16。

⁵莱佛士“城市计划”的白皮书中，第15条是关乎街道规划的记载，为“Each street should receive some appropriate name and it will become the duty of the police to see them regularly numbered”。引自 Buckley C.B., *An Anecdoted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84.

⁶清李钟钰《新加坡风土志》，（新加坡：南洋书局有限公司，1947），页10-11。

怒士”⁷的皆有。就是同时期出版的书刊中，依循比较严谨的翻译准则也是如此现象。下举二例：

官方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Jalan Mat Jambol	惹蘭蜜染坡	惹蘭默詹坡
Jalan Teratai	惹蘭地拉太	惹蘭德拉載

总体来说，早期社会一地数名或一名数写法的现象是极其普遍的，尤其是反映在街道的华文称谓上。

第二节：街名及华文译名标准化

鉴于上文所述，多元街名或华文译名的现象没有一致的标准，制造了诸多的不便，尤其是在邮寄地址的书写上。千其百种的写法，给各籍人士带来了“不是此族，不谙此语”的辨识困扰。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误导性，无法界定何为正确无误的译名或写法。因此，新加坡政府于1968至1970年展开了第一次街道华文译名标准化的审核任务。文化部广邀各大学、报馆、邮局、建屋局等机构人员组成“华文街名标准化委员会”，对翻译工作所依据的准则、译名的遣词用字或采用的翻译形式等进行全面的讨论，使所有的官方街道在华文译名上皆是划一的定位，并作为他日翻译之际的参考准则。笔者认为，其“标准化”大致以三方面为切入点：

- 一、该年之前一地数名或一名数种写法的街名与华文译名统一为一个街名、一个中文译名及一种写法。如“Jalan Besar”，早期有“惹蘭峇刹”、“惹蘭叻刹”或“惹蘭勿殺”的译名，均统一为“惹兰勿刹”。
- 二、相同的专名与相同的通名统一为一个中文译名及一种写法。如将“Bedok Road”和“Taman Bedok”两街道的相同专名统一译作“勿洛”。
- 三、相同音节统一为一个汉字译名及一种写法。如将“Maju Avenue”和“Malan Road”的相同音节 [ma]统一译作“马”。

⁷前为本地姜《新加坡街名沿革考》，见《星洲日报》（新加坡），1954年4月27日，版6。后为亚里《新加坡的街名》，1956年1月30日，版7。

这是新加坡自治独立后正式展开具官方力量支撑的政策之一。这之后几乎每隔一年出版的《新加坡街道指南》不外乎是官方政府传递资讯的媒介。其依据新加坡土地发展局所提供有关街道建设的最新进展，将新街道、新街名及其对照的华文译名和对旧街道重新审核后的新华文译名之消息公布开来，无形中建立了国民对官方街名及其所对应的华文译名的认知意识。

其实早在这之前，官方政府也出版了几本街道指南，但都没有华文译名的对照。倒是不少学者已意识到应该统一街名与华文译名，所以纷纷编纂出版了中西或中巫对照的街名录。虽然没有正式的“委员会”来进行全面的街名翻译工作，这些出版物确实是早期社会华族人士或多或少在使用华文译名的重要依据。相对来说，不论是译者自身还是译者们之间，基于缺乏系统及标准化的翻译准则，所以没有形成一个街名、一个华文译名及一种写法的统一现象。更关键的是少了官方力量的确切划一和忽略从上至下的普及推广。

第三节：街名录的版本

从新加坡开埠前迄今所编纂出版过的具有中西或中巫对照的街名录版本，兹列如下：

- 一、1877年的《华夷新语》、再版的《华夷通语》（1883）和《巫来油通话》（1939），是一本以汉字来对照，漳、泉、潮音来释注音读的国语读本。其一内容为埠头地名类，是对一些主要地名及街名的翻译，如俗称的“小班兰”被译为“班蘭结舌”，即指称马来文街名“Pandan Kechil”。虽然对街名的翻译数量极少，却是华族最早将马来文街名译成中文的纪录。惟《华夷新语》与《华夷通语》都已佚失。
- 二、潘醒农编著的《东南亚地名街名录》中之一内容〈新加坡街名录(1952)〉，较完整地列出了所有官方街名及其对照的中文译名。街路的中文名多根据路牌的写法，而无所依据的则普遍以音译来译注。1959年再推出赠订版，修订初版认为不妥之处，如将“Upper”从1952年的“盒吧”改为意译形式的“上”。同时也增加了数条新的官方街名和华文译名。

三、《星马通鉴》中有〈新加坡市中英文邮区街名录〉（1959）一表亦完整地列出了当时的官方街名及其对照的中文译名。大体来说，其与潘氏的街名录相去不远，唯不少华文译名的用字则显然不同，没有依循潘氏的译法。

四、1970年由新加坡文化部出版的《新加坡指南：附英华对照街道》乃是依据“华文街名标准化委员会”于该年初审定完毕的街道华文译名为准的街名录。基于经由官方的认可，其意味着街道华文译名的正式统一，并大规模地出版与兜售，受国人关注与采用。隔年出版的《新加坡街名录》仿如该版本的再版，改动不大。

五、1970年以后，几乎每一年都再版一本《新加坡街道指南》，皆附上了中西或中巫对照的街名录，作为公布新街道、新街名及其对照的华文译名和对旧街道重新审核后的新华文译名的媒介。

纵观上述的街名录，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命名或通译现象，却都是社会华族人士或多或少在使用中西或中巫对照的街名或译名的重要依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早期的华裔族群形成庞大的方言社会和对其他语文感到陌生，促使他们对华文译名（方音通译）和华文俗称（方音命名）的依赖极为强烈，作为本族沟通与他族交流之用。反之1970年后规范的审核工作，所有街道仅是一个官方街名及一个华文译名，删去了俗称，也修订了不少地域或方言字词。加上因时制宜的“英语为主，母语为辅”，中文译名几乎只使用在书面指称（新闻报导或证件公函等），而缺失其语用沟通的价值，华族社会几乎直以街名的官方称谓（罗马拼音）来指称。至于街名和译名的语用现象或比例问题，本文将不做进一步探讨。

而本论文的前、后两期之分就是建立在以1970年为界限，即第一次街道华文译名标准化审核工作的前和后。在规范划一及官方推行的前提下，对比前、后两期中巫街名及译名的演变现象。

第三章：“马来文”街道的变迁消长及街名特色

随着新国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街道建设也随之而有所倍增或删减。纵观今日 800 多条以马来文为名的街道数量，可说是遍布全岛各处。然而查阅早期地图及史料纪录，不难发现开埠迄今马来文街道在政治争执或语文政策的影响因素下经历了变迁消长的历史进程。就连街道命名也因时、因地、因人，即客观语境或主观意识下的落差而不同，自成时代的仅有特色。

第一节：开埠初期与城市计划下的沿海或沿河街道

据英国人皮尔逊（H.F.Pearson）著“*Singapore: A Popular History*”的两项记载¹：

- 一、“这个村落里大概有三十到五十座民房，其中有属于天猛公的哥哥阿朋·柔佛的、有属于天猛公的最可靠的随从之一因支·达立的……。这些人，除了从事他们认为是好汉的职业——海盗行为之外，主要靠捕鱼和采摘原始森林的野果为生。”
- 二、“这个港湾的唯一居民是‘海滨人’²，一个毕生都住在无覆盖物的小舟上，过着俭朴、漂泊的海上生活的民族。”

¹引自中文译著《新加坡通俗史》。见哈弗·皮尔逊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小组译《新加坡通俗史》，（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页 2。

²海滨人（Orang Laut）是带有“蒙古人种”血缘，属于“印度尼西亚种”的原始马来人。其来自中国大陆的云南，从公元前二千年时开始往东南亚迁移居住。同时也称为“澳大利亚种人”，其后裔“雅贡”族迄今仍散佈在马来西亚。当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属于“雅贡”族的海人已居住于岛上，并以捕鱼为生。参考郑文辉《新加坡赤道小红点》，（新加坡：蓝点图书私人有限公司，2009），页 144。

姑且不论开埠前岛上的人口比例³，仅从上述文献中足以得知当时的新加坡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海人”（原始马来人）或马来人定居于此的足迹，并以捕鱼行业为生。

他们的聚落主要分佈在红树林的沼泽、河口或河岸及沿海地带。其中“海人”聚集在“丹戎禺”岸外和“布拉尼岛”海湾；大部分的马来族群定居在 19 世纪初在邻近新加坡河河口的直落布兰雅一带所建立的一个马来渔村——“天猛公村”；其余的马来族群则散居在“马六甲村”、“甘榜格南”、“加冷”或“丹戎巴葛”等范围。而随着英殖民对外开放的政策统治，吸引了大量来自邻国的马来移民涌入，逐步向毗邻或内陆区域发展新移植区，如“马来村”、“芽笼士乃”和“巴西班让”等。内陆的新移植区仍是以沿河两岸为开辟点，如：“班丹河”（Pandan River）、“克兰芝河”（Kranji River）或“摩拉河”（Murai River）等。同时在莱佛士城市发展的规划之下，天猛公村被迁移到“丹戎巴葛”与“直落布兰雅”之间的一个地段、“甘榜格南”和“马六甲村”归给苏丹及其追随者和毗邻的土地则分配给武吉士人及阿拉伯人，重新且进一步划定了马来族群的聚居地。总体而言仍是被分置在河口、河岸及沿海一带，配以马来人多为渔民职业的身份。其实，纵观今日新加坡地理分布图也大致能够掌握早期马来人的活动范围及聚居区，地处在新加坡河的东端及新加坡岛南端的沿海区。[见附录(一)：表 1 及图 1。]

以马来群体为核心的活动范围，必以马来文为沟通媒介，对指称物的称谓或命名，包括当地街名必也以马来文为名。但基于在开埠前及开埠初期，岛上人烟稀少，许多地带没有被开发，更没有完善的道路建设，已开辟的“道路”不过就是一条泥路或乡间小道，作为彼此往来交际的工具而已，一般没被赋予专有的街名。反之往往是某区域内只有数条，更大可能是一条小道的缘故，所以指称该区也就同时涵括了内在的“道路”，地名也就涵括了街名。而大多数的地名以当地特有的地理环境、某植

³ 对莱佛士初登陆时所记载的人口多寡，至今仍有异议，主要为“一百五十人”、“二百一十人”、“三、四百人”及“五百人”之说。而较为肯定的是，其中有马来人、海人及华人的分布。参考邱新民编著《1819 年莱佛士登陆前已是一商港》及《莱佛士登陆前已知有新加坡》，见《新加坡寻根》，（新加坡：章金福，1983），页 117-121。

物、鸟类或重要地标来命名；换言之，直接取用地名的街名亦带有本土色彩的性质，如“罗弄克兰芝”（Lorong Kranji）就是以“克兰芝河”（Sungei Kranji）为名的。

第二节：自治独立前后“泛马来西亚化”意识的多类街道

50年代左右，为了脱离英殖民统治，以实现建立民主的新加坡理念，行动党政府积极鼓吹当时分治的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共组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即“马来西亚”；并不分人种民族、宗教信仰、语文背景或文化习俗，皆视自我个体为“马来西亚人”。因而政府期许的不仅是单方面所提倡与关注的理想政纲，而是需要整体国民的配合，以全国性的强大力量共同迈向“泛马来西亚化”的认同意识。当然，官方的立场或政策就扮演着从上到下贯彻一致目标的关键，给单元的行政、历史、文化或语文注入“马来西亚”色彩的新元素，推动意识打造的进程。势在必行的又以文化教育及语文政策为首要的变革前提，为一、主张“马来西亚文化”概念，鼓励各民族在保留固有的传统文化上，仍愿意认同、包容及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协力培育出一个全国性又相对中立的大众文化。二、主张以马来语为通用语，提高马来语为国语的政治地位，并劝导华人学习并应用马来语，作为民族之间沟通的基础，以行动表态成为马来亚人的意愿。

加上新加坡地处东南亚众马来族国家的中央位置，若不妥当处理华族与马来族或华语与马来语的文化问题，容易引起邻国的猜疑，使新加坡被套上以华人利益为依归的“第三个中国”的错误印象。而相继独立的邻国政府所采取的排华浪潮更让行动党政府意识到单一性的民族主义将引发的内在危机，即高调宣扬华人意识、华语与华族文化只会进一步深化马来民族对新加坡“他者”分子的对立偏见，在短期内被孤立起来。因此，行动党政府1963年自治独立后就刻不容缓地迈向多元民族的政策，在语言、宗教、教育及文化等方面都一律平等化，也就意味着马来人的权益问题及马来语的通用价值将在官方保证下获得同等的发展待遇。这现象一直持续到改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政策前，马来语相对其他语文来说是处于被全面推广的位置上，不论是沟通用语或教育媒介都以马来文为主导，甚至是街道建设也出现了许多的马来文街名，尤其是60年代末到70年初之间。官方街名中大量采用“Kampong”

（甘榜）、“Jalan”（路）、“Lorong”（罗弄），意指乡村、大路及小巷的马来文通名即可见此趋势。专名则主要以多类的马来文化为名，下举几例：

- 一、以马来半岛的地名，区名和河流名为名：高平街（Gopeng Street）、槟榔路（Penang Road）、丁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等。
- 二、以马来神话或传说为名：丹那美拉（Tanah Merah）、拉丁马士（Radin Mas）、武吉巴督（Bukit Batok）等。
- 三、以马来戏剧或剧作者为名：惹兰开鲁丁（Jalan Khairuddin）、惹兰弄朗沙（Jalan Dondang Sayang）、惹兰布德里朱拉朱利（Jalan Puteri Jula Juli）等。
- 四、以热带蔬果、动物或植物为名：兰莎路（Langsat Road）、惹兰柏泰（Jalan Petai）、惹兰卡卡都亚（Jalan Kakatua）、惹兰班丹（Jalan Pandan）等。
- 五、以马来民族的分支系属为名：亚拉路（Arab Road）、惹兰毛燕（Jalan Boyan）、实里打路（Seletar Road）等。
- 六、以马来节日为名：惹兰哈芝卡林（Jalan Haji Karim）、惹兰哈芝沙南（Jalan Haji Salam）、惹兰哈芝惹（Jalan Hajjah）等。

随新加坡经济起飞，官方政府以务实的态度，⁴提升英文实用价值的地位，作为国际经贸与科技交流的沟通工具。到了1970年以后，在双语教育的积极推行下，英文便逐步取代了马来文的主导地位。虽说马来语仍是国语，但在“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方针下，马来语只作为国人，尤其是马来民族不丧失本身文化精髓的要务而已，一改官方行政与社会层面主流语文的初衷。语言计划的转变连带地删减了一部分以马来文命名的街道或街名，从1960年末至1970年初约有1281条，到1990和2010年分别为996和850条的马来文街名数量来看，是随年减少的明显迹象，也透露了行动党于执政初期对马来文的过度靠拢似乎是出于硬性的政治用意。

⁴“务实”一词，引自吴元华《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 1954. 1965》著作中的说法。依其定义，务实是行动党政府施政、教育方针或语文计划的终极原则。因迫于世界局势及新加坡的生存，不得不因时制宜，而趋向高度功利主义的政策哲学。这也是吴氏在总结政府最终施行“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政策是必然趋势的解说。参考吴元华《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 1954. 1965》，（新加坡：联邦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99）。

第四章：70年代前、后阶段“马来文—华文”街名及译名的演变

1968-1970年是街道华文译名迈向标准化的历史性时期。审核委员会针对该年之前街道的中文译名缺乏公式化的翻译准则，而大量出现毫无系统及规律现象给予重视，并展开了对旧有的2500条及新增的500条街名一一进行了翻译工作，以求划一每条街道的中文译名，并收入在首部附有中巫及中英街道译名，即1970年《新加坡街道指南——附中英街道索引》。换言之，译名的前后变动就落在七项官方化的翻译准则之中，侧重咬字发音、恰当用字及翻译结构作拟定译名的考量。¹

第一节：语音

一、地域方言向普通话汉语拼音靠拢

自19世纪初至中叶，随着英殖民政府对移民劳工的需求，大批华南的华裔族群蜂拥而来，形成了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的结构。移民者主要来自福建省与广东省，具体划分有闽南、潮州、客家、广府与海南几类方言群体。他们聚集而居，口操本族或本籍贯的地域方言，因而在给马来文街名作译时自然也就用方言语音来通译。根据清

¹ “华文街名标准化” 报告书中七项准则为一、统一街道通名的中文译名，合共36项。其中英文通名采用意译，而马来文通名采用音译；二、以汉语拼音为音译基础；三、所选用的汉字发音，尽可能吻合或音近于在地的地域方言；四、所选用的汉字尽可能避免同音异义、同形异义或同音同形异义的现象，尤其是为在地的地域方言作译时所可能引起的不愉快或言外之意的误译困扰；五、音译时，不只依赖音读作译，也兼顾译名的文雅及意味深长的现象；六、删去不重读的辅音音位，以减少华文译名的字数；七、街道专名应以音译，而通名以意译为主。译自 Singapore. Committee on Standardized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treet Names,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Standardisation of Street Names in Chinese*,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1970), 4-5.

代李钟钰的纪录“福建男女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一人”²，占全华族人口的 29%，可知早期的方言群社会是以闽南语为主导的。从最早的译本《巫来油通话》中，收有约 50 多条中巫对照的街名，全数以闽南语来通译。兹列一些为例证：

官方街名	中文译名	闽南语注音 ³
Wayang Satu	花央沙誅	[hua1] [iaŋ1] [sa1] [tu1]
Tiong Bahru	衷峇魯	[thioŋ1] [pa24] [lo3]
Pandan Besar	班蘭勿殺	[pan1] [lan2] [but8] [sat7]
Payar Lebar	吧野黎峇	[pa1] [ia3] [le2] [pa24]
Telok Blangah	直落文壟亞	[tit8] [lok8] [bun2] [laŋ2] [a1]

再看潘氏编著的《东南亚地名街名录》，附在〈新加坡街名录〉前注有这么一项翻译凡例，为“新嘉坡街路中文名，多根据路牌者，因其沿用已久，不便更易，餘者或以音译，或用意译”⁴。这意味着某些街道在当时已有标示街名的路牌，不仅有官方街名，也有中文译名；而纵观其初版或再版街名录中所收入的中文译名，不难发现主要仍是闽南语作译现象。即是说有路牌为准的译名或没有路牌为准的译名（翻译者根据音读的相似进行汉字选用），都有闽南方音来通译的趋势。随后出版的《星马通鉴》亦是如此现象。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1952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1959	星马通鉴 1959
Jalan Engku Kadir	——	惹蘭英姑加例	惹蘭恩故格打

² 原文为“光绪七年英人所刊户口册云：福建男女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广州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二万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嘉应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琼州八千三百十九人，三州府生长之华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不列籍之华人二百七十二名，统计八万六千六十六人。”引自清李钟钰《新加坡风土志》，页 4。

³ 闽南音标用数字 1 至 8 为调值代码来表示八大调类，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及阳入。参考李如龙《〈华夷通语〉研究》，见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页 112。

⁴ 潘醒农编著《新加坡街名录》，见《东南亚地名街名录》，页 141。

Jalan Klapa	惹蘭屈勝巴街	——	惹蘭屈勝巴街
Jalan Setia	惹蘭砂茶	惹蘭沙茶	惹蘭砂茶街
Lorong Mandai	羅郎盟台	羅郎曼禮	羅郎萬禮
Lorong Pendek	羅郎秉悌	——	羅郎賓德
Permatang Pasir Muah	波密丹巴西毛	波密丹巴砂毛	波馬丹巴絲蔴
Sambau Street	三務街	三毛街	三務街
Sibu Road	施武路	詩巫路	詩巫路
Tanah Merah Besar Road	丹拿摩拉巫刹路	丹拿馬拉叻刹路	丹拿馬拉叻刹路
Wayang Street	哇燕街	——	哇燕街

随着政府的“推广母语教育”，极力倡导用华语来取代方言，成为不同方言集团之间的共同语言或华族母语的语政策，于 60-70 年间“简体字”和“汉语拼音”的推行下，委员会亦步亦趋，以汉语拼音作为翻译的基准。因此，就 1970 年及之后《新加坡街道指南》的中文译名来看，某些街名虽沿用了早期以闽南语作译的译名；同时也修订了不少的方言译名，取而代之的是以汉语拼音来作译。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 名录 1952	东南亚地名街 名录 1959	星马通鉴 1959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2010
Angsana Avenue	安心道	——	安心道	安莎娜道
Bukit Manis Road	——	武極孟尼士路	武吉明尼士路	武吉玛尼士路
Jalan Ambo Sooloh	惹蘭安婆庶羅	——	惹蘭安武梳羅 街	惹兰安波素罗
Jalan Singa	惹蘭勝呀	惹蘭勝加	惹蘭勝加街	惹兰新加
Jalan Yasin	惹蘭爺心	惹蘭椰心	惹蘭野新街	惹兰雅新
Lembu Road	廉蕪路	廉武路	廉蕪路	仑布路
Lorong Engku Aman	羅郎耶古亞門	羅郎英古亞門	羅郎恩固亞蠻	罗弄恩姑阿曼
Lorong A-Leng	羅郎厦寧	——	羅郎下寧	罗弄阿灵

Payar Lebar Road	巴爺黎峇路	——	巴爺黎峇路	巴耶利峇路 (2010年修订为巴耶利巴路)
Tanah Merah Kechil Road	丹拿摩拉吉枳路	丹拿馬拉吉枳路	丹拿馬拉吉只路	丹那美拉克基路

1979年华语运动推行之后，作为“标准华语”或“中国化”工具的汉语拼音更是普及。⁵从1970年新增街道的华文译名“Jalan Kembang Melati”（惹兰更邦莫拉地）、“Jalan Suasas”（惹兰苏亚沙）、“Lorong Halus”（罗弄哈鲁士）、“Merpati Road”（美芭蒂路）或“Pipit Road”（比笔路）等，至2010年“Merlimau Road”（猛里茂路）、“Pari Dedap Walk”（巴里德达径）等，及对旧有中文译名的修订，无不是尽可能地依循汉语拼音的原则。

马来文街名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1990	新加坡街道指南 2010
Jalan Gumilang	惹兰甘米郎	惹兰古米郎
Jalan Hang Jebat	惹兰韩日默	惹兰韩日巴
Jalan Minyak	惹兰民业	惹兰民亚
Jalan Senyum	惹兰申荫	惹兰申永
Jalan Surau	惹兰苏鲁	惹兰苏劳
Tebing Walk	德明径（1990年新增）	特丙径
Meranti Road	慕兰地路（1990年被删除）	美兰地路
Bukit Mugliston	武吉慕礼士顿 (1990年修订为武吉莫利士顿)	武吉莫利士顿

⁵ 参考郭振羽《语言政策和语言计划》，见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6），页69-70。

二、音节到音位为注音单位的倾向

马来语文以音节为音读及记音的基本单位，反之以音位为音节注音的最小单位。如“api”是由[a]与[pi]两个音节所组成，其中可细分为三个音位[a]、[p]与[i]，即两个元音音位及一个辅音音位作音节注音的构成成分。而某些时候，音位也能充当音节，一般是在某字词的首位、复元音中排列后面的元音音位或复辅音中的两个辅音音位都能充当音节的功能。当反映在马来文街道的中文译名上，往往是一个音节就一个汉字来作译。虽说早期或后期街道的译名都恪守此注音及翻译形式，但对比之下即可发现前期译名较着重在音节注音，而后期则倾向于音位注音。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	新加坡街道指南 南 1990-2010
Jalan Engku Kadir	惹蘭英姑加例	惹蘭恩故格打	惹兰恩姑卡迪雅	——
Jalan Hang Tuah	惹蘭漢大	惹蘭韓都哇街	惹兰杜娃	——
Jalan Masjid	惹蘭嗎習	惹蘭馬習街	惹兰马士日	惹兰马士日
Jalan Setia	惹蘭砂茶 惹蘭沙茶	惹蘭砂茶街	惹兰土地亚	惹兰土地亚
Lengkong Dua	玲功大	寧港杜哇	麟光都亚	麟光都亚
Lorong Muallop	羅郎毛洛 羅郎麻叻	羅郎摩亞洛	罗弄莫阿腊	——
Angus Street	晏呀街	晏呀街	安格士街	安格士街
Pukat Road	埔卡路 普吉路	埔卡路	普加德路	普加德路
Raub Street	纳街	纳街	劳勿路	——
Tuah Road	帶路	——	杜娃路	杜娃路

显而易见，1970年前的街道译名几乎皆是一个音节就一个汉字来作译。最早的马来文译本《巫来油通话》亦是如此，属于街道译名的有“Bukit Tuan Bernam”（武吉緞峇南）或“Sepoy Lines”（詩牌憐）及属于非街道译名的“laut”（老）、

“seluar”（寔赖）或“perempuan”（不弄伴）等。甚至还出现将几个音位或音节合并为一，直接就以一个汉字作译的现象。“Jalan Setia”（惹蘭砂茶街）就是将[ti]与[a]合成一个音节，以“茶”来译。可说是完全出自音节注音的考量，从而忽略了元音音位及辅音音位的音节化现象。这显然是受了闽南语通译的影响。

反观 1970 年后的《新加坡街道指南》则着重在音位注音的形式上，即把握字词中须“重读”的元音音位及辅音音位（一般能充当音节）或充当音节化的主要音位，单个地进行注音及汉字作译。因而能是几个汉字来译一个音节，完全取决于该语词中有几个要求“重读”发音的元音音位及辅音音位，或是几个属于音节化的音位。同是“Jalan Setia”，1970 年后的译名修订为“惹兰土地亚”，突出了复元音中主要元音音位[a]的注音，是音位音节化的产物。不论是列在语词前、中或后的位置，举凡“重读”或音节化的音位都加以注音。例：

语词“前”	语词“中”	语词“后”
Jalan Arif 惹兰阿立夫	Lorong Biawak 罗弄比阿华	Jalan Tempua 惹兰登布亚
Jalan Asas 惹兰阿莎士	Jalan Piala 惹兰比亚拉	Jalan Rumia 惹兰鲁米亚
Jalan Azam 惹兰阿占	Jalan Mutiara 惹兰慕迪雅拉	Lorong Tukang Dua 罗弄都干都亚
Lorong Ayam Hutam 罗弄阿炎乌丹	Jalan Suasas 惹兰苏亚沙	Jalan Bahagia 惹兰巴合宜亚
Telok Ayer Street 直落亚逸街	Jalan Bruas 惹蘭布雅士	Jalan Mulia 惹兰慕利雅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说审核工作之前街道译名就通数不是音节化音位注音的现象；反之仍是大多数的译名都把充当音节化的音位以一个汉字来作译，如“Jalan Ayer Panas”（惹蘭亞逸邦那士街）译出了“重读”的辅音音位[s]。这充其量只能说它从记音层面来展示主要音位，将有音读效果的音位都当成一个音节来作译，而非就其是不是音节的主要构成成分，能否独立成一个音节为考量。因此作译时也混淆不堪，有完全被译的“Jalan Limau Kasturi”（惹蘭漢加士株里）；也有音节化音位没有作译的“Jalan Darat Nanas”（甘榜達叻拿那），完全取决于译者的音读。反之 1970 年及后

的街道译名则不然，对独立成音节或“重读”的音位加以注音及作译，以构成音节的主要音位作个别分析，如：

马来文街名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90	新加坡街道指南 2010
Bulatan Pabrik	武拉丹巴布立	——	——
Flora Road	——	——	弗洛拉路
Jalan Biola	惹兰比奥拉	——	——
Jalan Koswi	惹兰哥士威	——	——
Jalan Mahir	惹兰馬希雅	惹兰马希雅	惹兰马希雅
Platina Road	——	布拉提那路	布拉提那路
Wak Hassan Drive	——	华克哈山通道	华克哈山通道
Lorong Kail	罗弄开怡	——	——

审核准则中之一项“删去不重读或不强调的辅音音位”，更确切看出后期的街道译名是音位注音的，以音位是构成音节与否的本位来划定作译的现象。好比“Jalan Ishak”就把早期的“惹蘭依沙哈”改动为“惹兰依萨”，把辅音音位[h]给省略。甚至是着重音位发音的正确性，从而选用更为正确的汉字或译名，就“Jalan Kubor”早期译为“惹蘭古峇”，显然是误译了[o]为[a]；而后期有所修正为“惹兰古坡”，无疑是对音位注音的关切。[见附录(二)：表2。]

第二节：书写形式

一、修订方言字与地域字

始于19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华南移民随苦力贸易而来，他们口操自己的语言，传承自己的文化，形成了多元文化与多语族群共处一国的现象。而语言最是能表现出一个社会群体离开自己的族群作客他乡的族群特征，也是维系一个族群的内聚力和文化承传的工具。自然而然地，固有的籍贯方言成为了某华族群体之间的沟通语言，也是社会族群对立划分的文化媒介。就早期街道译名还保有少数的方言字来看，可知籍

贯方言在早期社会是蓬勃通行的。兹列一些《巫来油通话》、《东南亚地名街名录》及《星马通鉴》中街道译名的方言字为例：

方言字	马来文街名	中文译名
勝	Jalan Klapa	惹蘭屈勝巴街
	Tanah Merah Kechil	丹那罵勝結舌
	Ayer Rajah Road	亞逸勝惹路
	Jalan Rajah	惹蘭勝惹
揸	Binjai Park	明揸苑
	Bukit Chermin	武極揸盟路
	Jalan Jaffar	惹蘭揸泡
	Jalan Jamal	惹蘭揸摩
	Jalan Jamahat	惹蘭揸馬合 惹蘭揸嗎合
菴	Kampong Amber	甘榜菴峇
	Lorong Ampas	羅郎菴巴士
叻	Sirat Road	實叻路 新叻路
	Damar Darat Road	打嗎達叻路
	Jalan Ulu Seletar	惹蘭于魯實乞叻街
	Kampong Darat Nanas	甘榜達叻拿那
	Lorong Muallap	羅郎麻叻
	Siglap Road	實紇叻路 實乞叻路

当然，群体性的生活不会只是单方面的族群分化，也共存着多元文化、多语族群社会内的文化共融或同化的交际模式。像在早期社会，不少青壮年的移民男子选择落地生根，并与当地的异族女子通婚，其中又以巫裔女子为多。他们的后裔成了在地的土生华人，被赋予“峇峇”与“娘惹”的新族群身份。其不仅是华族分化的在地形

式，更是属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马来亚”时期的马六甲、檳城及新加坡社会独有的族群结构。换言之，“峇峇”与“娘惹”的概念在早期的新加坡社会是普遍认知的，继而“峇峇”与“娘惹”的族群称谓，乃至新造字“峇”皆基于当下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而逐步产生的地域字词。早期的街道中文译名也惯用“峇”字来作译，如“Bajera Lane”（峇齊里巷）、“Bali Lane”（峇厘巷）、“Bernam Street”（峇南街）、“Dunbar walk”（丹峇路）或“Lorong Batawi”（羅郎峇打威）等。

普通话可说是现代汉语的指标，决定了地域变体在现代汉语中属于哪个语体及其使用频率的高低。即是不属于中国固有文化或官方语言的地域变体，如方言字或地域字往往是现代汉语中低使用率或渐次被删除的位置。有如方言字“勝”，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已经查找不到，电子索引的《中文之星》软件也将它们归入低使用率的难检字一环。而随着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建交关系，普通话的经济价值越加增长，新加坡的华文语境越是向普通话的体制靠拢，尤其是在1990年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建交公报之后。因此，对于低使用率或难检的“勝”、“揸”、“菴”、“叻”和“峇”也不免在后期的街道译名中逐步被替换，以现代汉语中发音相同或相似、常用且更简易书写的汉字来取代。如方言字“勝”[la55]换成“拉”[lā]或“菴”[am24]换成“安”[ān]等，以音读相近的汉语拼音汉字来更易多是闽南语通译的方言字。而地域字“峇”于2010年也几乎改成了“巴”，以求在地的华文语境与现代汉语的规范及查找或使用上的便捷及经济效应。

（一）、方言字的修订：

马来文街名	巫来油通话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Jalan Klapa	——	惹蘭屈勝巴街	惹蘭屈勝巴街	惹兰克拉巴
Tanah Merah Kechil Road	丹那罵勝結舌	丹拿摩拉吉枳路	丹那美拉克基路	丹那美拉克基路
Binjai Walk	——	明揸路	明哉路	明才径
Jalan Jamal	——	惹蘭揸摩	惹蘭惹馬爾街	惹兰惹吗
Kampong	——	甘榜安帕	甘榜菴峇	甘榜安柏（1990-

Amber				2010 年被删除)
Lorong Ampas	——	羅郎安巴士 羅郎安拔士	羅郎菴巴士	罗弄安拔士
Sirat Road	——	實叻路	新叻路	西勒路
Siglap Road	——	實吃叻路 實紇納	實乞叻路	实乞纳路

(二)、地域字的修订: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 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 指南 1970	新加坡街道 指南 1990	新加坡街道 指南 2010
Bajera Lane	峇齊里巷	——	巴芝莱巷	——	——
Bernam Street	峇南街	峇南街	柏南街	柏南街	柏南街
Lorong Batawi	羅郎峇打威	羅郎吧達威	罗弄巴达威	罗弄巴达威	罗弄巴达威
Pasir Laba Road	巴砂拉峇路	巴沙拉峇路	巴西拉峇路	巴西拉巴路	巴西拉巴路
Payar Lebar Road	巴爺黎峇路	巴爺黎峇路	巴耶利峇路	巴耶利峇路	巴耶利巴路
Jalan Bahar	——	——	惹兰峇哈	惹兰峇哈	惹兰巴哈
Jalan Kebaya	——	——	惹兰克峇耶	惹兰克峇耶	惹兰克巴耶
Lorong Bakar Batu	羅郎峇卡峇 株	羅郎峇加峇 株	罗弄峇加峇 株	罗弄峇卡 峇株	罗弄巴卡巴 株

二、往简易字体的形式发展

语言讲求经济原则，是口头沟通的需要，也是书面书写的趋势。当反映在街道译名的中文书写或择选哪个恰当的汉字之际无不依循精简、易写，也易记的模式。随着 70 年代，“简体字”的全面推行，委员会公布的报告书中就涵括“以易读的汉字来通译”之一项。广义来说，“易读”不可能单一地针对发音的容易或正确，却还涉及汉字的书写形式及其普遍性，即只有在大众常用与熟知、易写及易记的基础下，方能

对某字产生音读与知识的直接认知。因此，街道译名的选词用字亦是审核工作的其一考量。纵观 1970 年前、后的街名录，不难发现后期译名的中文书写有趋向简易发展的现象。如下例：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Binjai Walk	明揸路	明哉路	明才径
Bugis Street	武疑士街	武疑士街	武吉士街
Chiku Road	織姑路	鷓鴣路	赤果路
Jalan Ampas	惹蘭奄北士 惹蘭安拔士	惹蘭奄派士街	惹兰安拔士
Lembu Road	廉蕪路 廉武路	廉蕪路	仑布路仑
Jalan Klapa	惹蘭屈勝巴街	惹蘭屈勝巴街	惹兰克拉巴
Jalan Raya	惹蘭拉耶	惹蘭拉爺	惹兰拉耶
Payar Lebar Road	巴爺黎峇路	巴爺黎峇路	巴耶利峇路 (2010 年修订为巴耶利巴路)
Silat Road	施叻路	實叻路	石叻路
Tanah Merah Besar Road	丹拿摩拉巫刹路	丹拿馬拉叻刹路	丹那美拉勿刹路

笼统来说，街名录“文字改革”的进程可以总括为以下三方面的修订：

(一)、字体的简化

这主要是繁体字到简体字的变化。1970 年及之前仍是以繁体字为书写形式，而该年之后已全面地修订为以简体汉字来通译，无形中对字形的简化起了相对重要的作用。

(二)、字形的简化

这主要是择选音读相同，但笔画较少的汉字来通译。如“安”、“巴”“美”、“克”、“吉”、“拉”等都是高使用率的通译字，字形简单，笔画量少。

相较于早期中文译名的艰深难写与笔画繁复，如“織姑路”和“鷓鴣路”等往往只以音读为准的考量，反之对通译汉字的选用纯粹是任意性的。

（三）、高频使用率

这主要是择选较为大众熟知或惯用的基本字词来通译。一般来说，字形简单，笔画量少的汉字多为汉语中的常用字词。举例来说，相较于早期的“廉蕪路”，修订后的“仑”与“布”在口语或书写上都有较高的使用率，为某语言群体更普遍认知的汉字。而其偏高的实用性是促使易读、易写与易记的关键因素。

委员会也借鉴了早期多元的中文译名，并取用其中最简易书写的，作为标准化的街道译名。像在潘氏《东南亚地名街名录》的〈马来语地名释义〉一章就列出了与马来语地名相对应的中文译名，其中“Bukit”为“武吉”或“武極”、“Tanah”为“丹那”或“丹拿”皆可。⁶再以1970年后作为官方认可及划一的“武吉”与“丹那”的译名来看，可知委员会是从简易书写的角度来考量。而不论是1970年或该年以后新增的街道译名或对旧有译名的修订皆恪守简易书写的发展脉络，如：

马来街名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90	新加坡街道指南 2010
Jalan Ahmad Ibrahim	惹兰阿末依布拉欣	惹兰阿末依布拉欣	惹兰阿末依布拉欣
Jalan Chempah	惹兰真巴	惹兰真巴	惹兰真巴
Lorong Puntong	罗弄本同	罗弄本同	罗弄本同
Jalan Arif	惹兰阿立夫	惹兰阿立夫	惹兰阿立夫
Jalan Gumilang	惹兰甘米郎	惹兰甘米郎	惹兰古米郎
Jalan Naung	惹兰纳翁	惹兰纳翁	惹兰那翁
Bukit Mugliston	武吉慕礼士顿	武吉莫利士顿	武吉莫利士顿
Jalan Tiong	惹兰塚	惹兰冢	惹兰冢
Lorong A-Leng	罗弄下龙	罗弄阿灵	罗弄阿灵

⁶潘醒农编著《马来语地名释义》，见《东南亚地名街名录》，无列页数。

Brani Road	——	——	布兰尼道
------------	----	----	------

据笔者归纳后发现，2010年街道译名大体只用了342个汉字。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有“兰”（482次）、“惹”（462次）、“拉”（100次）、“曼”（96次）、“巴”（95次）、“罗”（94次）、“弄”（94次）、“基”（84次）、“士”（71次）、“宜”（63次）和“马”（51次）等，都为笔画量少的简易字，属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基本汉字。⁷[见附录(三)：表3。]

三、选用正面或中立色彩的通译汉字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符号，是语音形式（能指）和语义内容（所指）结合一体的记号行为。但二者的关系却是任意性的，能指与被意指的“事物”之间并非单一或绝对的组合。不仅是声音的选择出自随意，且内容本质也可以无限放大，所指不是“一事物”，还包括“事物”的心理表象，即所指之情绪的、意识形态或概念的心理特点。⁸换言之，语言所指称的事物有具体面（内延）及抽象面（外延）两层次；而积淀的文化历史、社会心理背景、集体或个体情感及审美意识等语境都与语言划上等号，赋予语义一定的附加色彩。因而特定的字或词在多元语境的前提下，容易触及语义的曲解诠释。

这也是委员会给予关注的一项审核，尽可能避免采用或修订早期译名中容易引起误解而产生不舒服或不愉快音译汉字，尤其是同音异义、同形异义或同音同形异义的音译汉字。反观早期的街道译名是音读而译的形式，对通译汉字的选用一般是任意性的，往往忽略了音译汉字的色彩义。如《巫来油通话》的“Tanah Merah Besar”

（丹那罵撈勿殺）或“Kebun Sibū”译为（葛文死匏），其中“殺”及“死”是华族文化对凶祸、不吉利谐音词语的禁忌，所以后期的街道译名修订为“刹”及“施”或“诗”，可说是采用了比较中立的通译字。甚至是：

⁷ 这些笔画量较少的通译字皆被收进《汉语常用字（国家颁布）字典》中。该字典是根据中国语委和国家教委于1988年初联合颁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共收常用字3500个）编写而成。参考周长楫编著《汉语常用字（国家颁布）字典》，（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⁸ 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罗兰·巴尔特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页27-29。

- (一)、与粗俗或“性”文化有关：“Jalan Ampas”（惹蘭奄北士或惹蘭奄派士街）、⁹ “Jalan Abdul Manan”（惹蘭鴨都門南街）¹⁰和“Kuching Road”（龜精路）等。
- (二)、与宗教或信仰有关：“Jalan Wakaff”（惹蘭哇加佛）。
- (三)、与否定或“不”意识有关：“Bugis Street”（武疑士街）和“Bragi Road”（不拉基路）。
- (四)、与政治认同有关：“Jalan Loyang Besar”（甘榜洛阳）和“Kuala Loyang”（瓜拉洛陽路）。
- (五)、带贬义的形容词或名词：“Jalan Bintang Tiga”（惹蘭醜酖地加）、“Jalan Eunus”（惹蘭伊怒士或惹蘭有怒士街）、“Jalan Kemaman”（惹蘭甘嗎蠻街）、“Jalan Pisang”（惹蘭祕山）、“Jalan Nuri”（惹蘭奴利街）和“Selegie Road”（實利己路）等。

后期的街道译名以换字法或删除法方式来贯彻中立或文雅（吉祥）意识的通译形式，从而修订早期带有负面或禁忌色彩的通译字。就如报告书所兹列“音译形式不应该只是单方面地依赖语音翻译，应同时兼顾文雅及意味深长的字词意义”的准则。如下例：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替换方法	通译形式
Bragi Road	——	不拉基路	布拉宜路（1990-2010年被删除）	换字法 删除法	中立语
Bugis Street	武疑士街	武疑士街	武吉士街	换字法	文雅语
Jalan Ampas	惹蘭奄北士	惹蘭奄派士街	惹兰安拔士	换字法	中立语
Jalan Abdul Hamid	惹蘭亞杜哈密	惹蘭鴨都哈密街	——	删除法	——
Jalan Abdul	惹蘭亞杜門那	惹蘭鴨都門南	惹兰亚都曼南	换字法	中立语

⁹ “奄”古时通“阉”，带有“阉割”的“性”禁忌。

¹⁰ “鸭”在方言中有指为男妓的粗俗语义。

Manan		街	(1990-2010 年 被删除)	删除法	
Jalan Eunus	惹蘭伊怒士	惹蘭有怒士街	惹兰友诺士	换字法	中立语
Jalan Nuri	惹蘭那里	惹蘭奴利街	惹兰努力	换字法	文雅语
Jalan Pisang	惹蘭祕山	惹蘭秘山街	惹兰比山	换字法	中立语
Jalan Sinar Bintang	惹蘭醅酏	——	惹兰西那宾丹	换字法	中立语
Kuching Road	龜精路	古晋路	——	删除法	——
Kuala Loyang	瓜拉洛陽路	瓜拉羅陽路	瓜拉洛阳路	换字法	中立语
Selegie Road	實利己路	實利己路	实里基路	换字法	中立语
Jalan Yasin	惹蘭爺心 惹蘭椰心	惹蘭野新街	惹兰雅新	换字法	文雅语
Jalan Greja	惹蘭乞里者	——	惹兰格列惹	换字法	中立语
Jalan Wakaff	惹蘭哇加佛	惹蘭華加夫街	惹兰华卡夫	换字法	中立语

而有些早期的街道中文译名采用了意义相对固定的合成词来作译，如“Bukit Gombak”（武極孔墨）、“Jalan Yahya”（惹蘭爺爺）或“Pender Road”（扁擔路）。基于“孔墨”、“爺爺”和“扁擔”帶有被意指“事物”的特定语义，不仅容易引起使用者对通译词作特定的语义联想，产生中与巫文之间语义的错误对照；甚至与就音而译的原则产生出入，形成语义或翻译形式的混淆现象。因而在后期的街道译名中，委员会采用较中立的通译字，为“武吉甘柏”、“惹兰雅雅”和“秉德路”。

纵观 1970 年以后新增或修订的街道中文译名，可以发现为数不少的通译汉字都带有文雅色彩的语义，偏好使用“吉”、“达”、“雅”、“美”等字词，贯穿趋吉的文化想象。可说是在对应马来文发音的同时，也兼顾文字趋雅避俗的内质考量。

如：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90-2010
Bangkit Road	——	——	——	万吉路
Banda Street	萬拿街	萬拿街	万达街	万达街
Adur Road	亞株爾路	亞得路	爱德路	——
Bukit Chermin Road	——	武吉照明路	武吉慈明路	武吉慈明路
Buyong Road	武楊路	巫楊路	芙蓉路	芙蓉路
Jalan Elok	——	——	惹兰益乐	惹兰益乐
Jalan Jati	——	——	惹兰雅蒂	惹兰雅蒂 (2010 年被删除)
Jalan Siap	——	惹蘭詩雅	惹兰诗雅	惹兰诗雅
Lorong Bunga	——	羅弄文雅	罗弄文雅	罗弄文雅
Lorong Mega	——	羅弄美佳	罗弄美佳	罗弄美佳

第三节：语文结构

一、从萌芽到自觉奠定的意译发展

早期的《东南亚地名街名录》及《星马通鉴》的街名翻译已采用初步的意译形式。诚如潘氏所认为华侨将英文的“Road”译为“律”是“祇就音譯，实属未妥”，反之应“以国音為準，音義始皆切合”，对译与被译之间的音、义内质及对应关系加以考量。¹¹因此一律改以“路”来通译。其他“音义切合”的例子兹列如下：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1952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1959	星马通鉴 1959
Bukit Ho Swee	武極和瑞	武極河水	河水山
Jalan Payoh Lai	惹蘭巴窰来	——	惹蘭巴窰内街

¹¹潘醒农编著《新加坡街路名注》，见《东南亚地名街名录》，页 141。

Lichi Avenue	荔園路	荔枝道	利濟路
Lorong Ong Lye	羅郎黄梨	——	羅郎黄梨
Toa Payoh Road	大巴窰路	大巴窰路	大巴窰路

这时期所采用的意译形式不过是萌芽阶段，所以意译化的街名为数不多，而且意译的结构没有规律。以通名的意译现象为例：

- (一)、“Upper” 一词，有以音译的“盒吧”或意译的“上”来通译。
- (二)、“Pulau” 一词，有以音译的“布勞”或意译的“岛”来通译。
- (三)、“Bukit” 一词，有以音译的“武極”或意译的“山”来通译。

而后期的街名意译在划一及有所参照的准则之下是比较自觉，而且系统进行。其不纯粹只是译与被译者之间音及义的彼此对应关系，往往还是就通译字的语义内质作个体考量，如通译字的字形结构或基本义的问题。换言之，其不再限于单一的译与被译之间音的对照及义的翻译，而是从多元角度个别地审核译与被译者的音及义的内质，是就表层到全面的阶段，是早期的萌芽到后期的自觉、逐步奠定，并更为规则的意译形式。大体来说，后期的街名主要可以分成四方面的意译内容：

(一)、描述性的英文通名意译化

依据 1970 年标准化街道中文译名所兹列的准则，新加坡街名中属于‘描述性的术语’，即通名采用意译，个别对应的是相对稳定且划一的通译字，共 36 组。严格来说，意译化的通名只有 31 组，皆是英文书写；另外 5 组的马来文通名仍是音译形式。这与政策所重的语言有关，随着“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推行，新加坡社会对马来文图存音的辨识，缺失义的理解。对此，本文将不作深入研究。不论如何，后期街名中的英文通名一律意译为其相对应且划一的通译字或词。如下例：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 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 道指南	早期英文通名 意译现象	后期英文通名 意译现象
Binjai Park	明渣苑 明渣原	明哉原	明才园	“苑”或“原” 皆可	统一为“园”
Bukit Batok Road	武極巴多苑	——	武吉巴督路	“Road”、 “Park”皆可以	统一为“路”

				“苑”作译	
Dunbar Walk	丹巴道	丹峇路	丹宝径	“道”或“路”皆可	统一为“径”
Lichi Avenue	荔園路 荔枝道	利濟路 荔枝大道	荔枝道	“路”、“道”或“大道”皆可	统一为“道”
Attap Valley Road	亞答路	亞答路	亞答谷路	“Valley”没有作译	统一为“谷”

早期还出现某一通名同时采用音译及意译形式来作译，即双重翻译的现象，如“Jalan”通名，同时采用音译的“惹兰”与意译的“街”或“路”。后期则统一，马来文通名一律采用音译形式。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Jalan Kemaman	惹蘭甘嗎蠻街	惹蘭甘馬挽街	惹兰甘马挽
Jalan Nuri	惹蘭那里	惹蘭奴利街	惹兰努力
Jalan Teck Kee	惹蘭德記	惹蘭德記路	惹兰德记
Jalan Tua Kong	——	惹蘭舵公路	惹兰大公
Jalan Tiga Ratus	惹蘭地加拉突士	惹蘭地加拉都士街	惹兰迪卡拉都士

(二)、语文混用结构中描述性的英文名词意译化

报告书中另立“街名的专名应是音译，描述性的名词可以意译”的准则，是普遍出现在马来语文与其他语文混用结构的街名中，对非通名却属于描述性质的英文名词而言，一律采用意译。如下例：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Bedok Reservoir Road	——	——	勿洛蓄水池路
Jalan Batalong East	——	——	惹兰巴达隆东
Mount Sinai Road	——	——	西乃山路
New Upper Changi	——	——	新樟宜路上段
Upper Changi Road	上章儀路	盒吧漳宜路	樟宜路上段

Jalan Seaview	——	——	惹兰海景
---------------	----	----	------

(三)、音译词的意译化

在普遍或高使用率之下，某些音译词对应的是相对固定与规范的一组通译汉字，彼此有着一致的所指。以对应的通译汉字来翻译街名实则是采用了意译形式，不仅是“音义切合”，更符合不单是依赖语音翻译，同时兼顾“意味深长”的译名指标。

1、地名音译词的意译化：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Ipoh Lane	怡保巷	怡保巷	怡保巷
Klang Road	乞蘭路	乞蘭路	巴生路
Bali Lane	峇厘巷	峇厘巷	峇厘巷（巴厘巷）

2、事物音译词的意译化：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Sampan Place	——	——	舢舨坊
Lorong Longan	——	——	罗弄龙眼
Lorong Limau	羅郎里毛 羅郎里茅	羅郎林毛	罗弄柠檬

笔者发现在马来语与闽南语的混用结构中，某些非描述性质的闽南语专名也有意译现象，如“Jalan Tiong”（惹兰冢）、“Jalan Tua Kong”（惹兰大公）或“Jalan Tauge”（惹兰豆芽）等。许云樵认为任何一种语言若被他种语言的语词采用时，将被该语言的语法所同化。¹²这些闽南语专名就是闽南方音的马来语化现象，即闽南语音译为马来语。而以原出闽南语的词汇给马来语化的街名作译时，亦是音译词的意译化。

(四)、马来文街名的概念义意译化

¹²许云樵著《华巫通语数典忘祖》，见《马来亚丛谈》，页 189。

某些马来文街名之由来概念采用意译形式。通译汉字的字形结构，即整字或部件的基本义作物种分类与概念隐喻，从而对应街名的概念义。有些在概念隐喻的同时兼顾音义一致的原则，有些却只求概念隐喻的前提。不论如何，其与早期纯粹“就音而译”的翻译形式构成了显著的改变。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 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 指南	街名概念义意译现象
Chiku Road	織姑路	鷓鴣路	赤果路	以水果为名。整字“果”有物类对应的作用。
Duku Road	杜姑路	杜古路	杜果路	以水果为名。整字“果”有物类对应的作用。
Changi Road	章儀路	漳宜路	樟宜路	以树种为名。部件“木”有物类对应及概念隐喻的作用。
Bukit Teresa Road	武極託里砂路	武吉德利沙路	武吉德莉莎路	以女性名字为名。整字“莉”、“莎”有概念隐喻的作用。 ¹³

(五)、语汇结构意译化

早期的街名翻译已初步采用以语汇为单位的意译形式，但为数不多。而后期的街名翻译则更自觉的就语汇结构中译与被译之间的意义对应，不论是英文通名或专名及马来文通名或专名，就街名中的个别语汇作直接的语义翻译。如下例：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Bukit Merah	武極米拉区	——	红山
Lorong Realty Park	——	——	实业园巷
Mimosa Road	——	——	含羞草路

¹³ 《集韵》中释“莉”为“姓也”，而《现代汉语词典》释“莉”与“莎”为带香气的花或草名。现代汉语中往往隐喻为女性的美丽。

Rambutan Road	红毛丹路	红毛丹路	红毛丹路
Kereta Ayer Road	乞例打亞易路	乞例打亞逸路	水车路
	乞例打亞逸路		

二、纯马来文的单语或双语到双语或多语混用模式的转变

语言是服务交际的工具，尤其在多元族群的语境之下。而高频的语言接触不仅生发双语和多语氛围，往往还是语言内质自行走向语言混合的趋势因素，即形成语码混用和混合语言的两类模式。前者主要是就语法结构来说，一语码并入另一语码，出现双语码于一格的现象；后者则是语音与语义的变异层面，语码的个体差异逐步交汇与融合，从双语码到语码新体（变体）产生的进程。不论如何都尽显了语言的包容性及融合性特点，形成浓厚的地域性语言或地域变体。纵观早期的马来文街名，已有为数不少是双语或多语混用的组合结构，大体可分成四类：

（一）、马来文专名+马来文通名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马来文专名+马来文通名	
			专名	通名
Jalan Yasin	惹蘭爺心 惹蘭椰心	惹蘭野新街	Yasin	Jalan
Lorong Bakar Batu	羅郎峇卡峇株 羅郎峇加峇株	羅郎峇加峇株	Bakar Batu	Lorong
Ayer Manis	亞逸明尼士	——	Manis	Ayer
Bukit Ho Swee	武極和瑞 武極河水	河水山	Ho Swee	Bukit
Padang Terkukor	巴當德古柯	巴當德古加	Terkukor	Padang
Pasir Ayer Samak	巴砂亞逸珊末 巴砂亞逸沙末	巴沙亞逸三末	Ayer Samak	Pasir
Pengkalan Pakan	旁加蘭巴干	邊加蘭北干	Pakan	Pengkalan
Pulau Brani	布勞巫拉尼	布拉尼島	Brani	Pulau

Tanjong Iran	丹戎依蘭	——	Iran	Tanjong
Kampong Bintang	甘榜酪酏 甘榜明丹	甘榜酪酏	Bintang	Kampong
Telok Mata Ikan	直落嗎淡伊干	直落馬打伊干	Mata Ikan	Telok
Permatang Pasir Muah	波密丹巴西毛 波密丹巴砂毛	波馬丹巴絲蔴	Pasir Muah	Permatang

(二)、马来文专名+英文通名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马来文专名+英文通名	
			专名	通名
Bras Basah Road	勿拉士峇沙路	叻拉士巴沙路	Bras Basah	Road
Angsana Avenue	安心道	安心道	Angsana	Avenue
Banda Street	萬拿街	萬拿街	Banda	Street
Bajera Lane	峇齊里巷	峇齊里巷	Bajera	Lane
Rhu Cross	魯十字路 禺十字路	禺十字路	Rhu	Cross
Taseh Utarah Estate	達式吁打拉園	打些于達拉園	Taseh Utarah	Estate
Upper Serangoon Road	盒巴實籠崗路	盒吧實籠崗路	Upper Serangoon	Road
Changi Village	章儀村	漳宜村	Changi	Village

(三)、英文专名+马来文通名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英文专名+马来文通名	
			专名	通名
Jalan Mandy Kapore	惹蘭蠻地加卜利	惹蘭曼地加寶 利街	Mandy Kapore	Jalan
Lorong Marzuki	羅郎馬珠記	羅郎瑪裕基	Marzuki	Lorong
Bukit Mugliston	武極武里士頓	穆格里士敦山	Mugliston	Bukit

Kampong Marican	甘榜馬利根	甘榜瑪利根	Marican	Kampong
-----------------	-------	-------	---------	---------

(四)、闽南语专名+马来文通名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闽南语专名+马来文通名	
			专名	通名
Bukit Ban Kee	武極明基 武極萬記	明基山	Ban Kee	Bukit
Jalan Hok Chye	惹蘭福才	惹蘭福財街	Hok Chye	Jalan
Kampong San Teng	甘榜雙丁 甘榜山亭	甘榜山頂	San Teng	Kampong
Lorong Koo Chye	羅郎古齋 羅郎龜菜	羅郎邱財	Koo Chye	Lorong

早期马来文街名的混用结构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三大语文，即马来文、英文及闽南语的混用模式，与当时多元族群的人口比例及语言同化息息相关。好比马来语中杂有方言的峇峇马来话，大部分保留在“闽南语专名+马来文通名”结构中，主要是就专有人名或地名的引用。其中又以纯马来文的单语结构数量最多，而且马来文通名是多类采用的，如“Jalan”、“Lorong”、“Bukit”、“Kampong”、“Tanjong”、“Telok”等。其不全然是街道类名的指称，有者是标示地质或环境现象的类属称谓；不如后期为展示街道类名而划一街道通名的自觉意识。不论如何，早期的马来文街名具有以马来文书写的焦点概念，马来文色彩是相当浓厚的。

1970年标准化审核之下，对旧有的街名或街名结构小部分的沿用之外，其余者则有两种模式的分化，既强化“马来文”意识和淡化“马来文”意识的特征。

(一)、强化“马来文”意识

其是自治独立前后“泛马来西亚化”所实施强化马来族群或文化色彩与营造多元种族并融的概念政策，而全面推广马来语的产物。大量的街道命名以纯马来文的单语结构为多，大体由“Jalan”或“Lorong”的马来文通名与范畴广泛的马来文专名加以组合而成。如“Jalan Arif”、“Jalan Arnap”或“Lorong Chencharu”、“Lorong Danau”等众多例子。

(二)、淡化“马来文”意识

随着“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方针，英文的实用价值逐步提高，进而影响了街名的语文混用结构，使早期纯马来文的单语结构到后期双语混用结构或早期双语混用结构到后期多语混用结构的转变。不仅是就没有通名、只是纯马来文专名的街名补上英文通名，甚至不少是早期普遍采用的马来文通名，在后期已失去了通名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划一的新街道通名，补在单语或双语结构的街名后端，形成更多语汇混用的模式。而标准化的 36 条街道通名中，英文通名就占了 30 条的大多数。可见混用结构中英文使用的高比例，从而淡化了马来语文的核心色彩。如：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 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1990	新加坡街道指南 2010
Bukit Ho Swee Link	武極和瑞 武極河水	河水山	——	河水山连路
Geylang Bahru	——	——	芽笼峇魯	Geylang Bahru Road 芽笼峇魯路
Pasir Ris Road	巴詩立	巴詩立	巴西立路	巴西立路
Tanjong Kling	丹戎吉寧	丹戎吉寧	丹戎吉宁路	Tanjong Kling Road 丹戎吉宁路
Lorong Realty Park	——	——	实业园巷	实业园巷
Kampong Arang Road	——	——	甘榜阿兰路	甘榜阿兰路
Changi Village Road	章儀村	漳宜村	樟宜村路	樟宜村路
Bukit Panjang Road	武極班讓	武吉班讓	武吉班让路	武吉班让路
Bukit Purmei Road	武極寶美	武吉寶美	武吉宝美	武吉宝美路
Tanjong beach Walk	——	——	——	丹戎海滨径

再说，语言态度的改变也间接地删除了一部分纯马来文单语结构的街名，尤其是 1970 年之后更为显著。同时新增了不少双语或多语混用结构的街名，普遍采用英文语汇为专名，即马来文专名+英文专名+英文通名、英文专名+马来文通名或马来文专名+英文专名+马来文通名的模式。如：

1、马来文专名+英文专名+英文通名

马来文街名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90-2010	马来文专名+英文专名+英文通名		
			专名 (马来文)	专名 (英文)	通名 (英文)
Bedok Reservoir Road	勿洛蓄水池路	勿洛蓄水池路	Bedok	Reservoir	Road
Geylang East Avenue	——	芽笼东路	Geylang	East	Avenue
Tanjong beach Walk	——	丹戎海滨径	Tanjong	Beach	Walk
Tanah Merah Ferry Road	——	丹那美拉渡轮路	Tanah Merah	Ferry	Road
Upper Paya Lebar Road	巴耶利峇路上段	巴耶利峇路上段	Paya Lebar	Upper	Road
Old Jurong Road	——	旧裕廊路	Jurong	Old	Road
New Loyang Link	——	新罗央连路	Loyang	New	Link
Teban Garden Road	德曼花园路	德曼花园路	Teban	Garden	Road

2、英文专名+马来文通名

马来文街名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2010	英文专名+马来文通名	
		专名 (英文)	通名 (马来文)
Jalan Woodbridge	惹兰板桥	Woodbridge	Jalan
Jalan Seaview	惹兰海景	Seaview	Jalan
Jalan Rachek	惹兰拉泽	Rachek	Jalan
Jalan Pacheli	惹兰巴奇里	Pacheli	Jalan
Jalan Noordin	惹兰诺丁	Noordin	Jalan

3、马来文专名+英文专名+马来文通名

马来文街名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2010	马来文专名+英文专名+马来文通名		
		专名	专名	通名

		(马来文)	(英文)	(马来文)
Jalan Batalong East	惹兰巴达隆东	Batalong	East	Jalan
Lorong Woodlands Kechil	罗弄兀兰克基	Kechil	Woodlands	Lorong
Jalan Novena Timor	惹兰诺维娜蒂摩	Timor	Novena	Jalan
Jalan Lembah Thomson	惹兰仑巴汤申	Lembah	Thomson	Jalan
Jalan Novena Utara	惹兰诺维娜乌打拉	Barat	Novena	Jalan

后期新增街名中，还有通过专名沿用，却以某个英文通名去更替之前的英文通名，而产生新街名的混用结构。这显然是缘于经济原则的运用，不仅使街名拟定便捷，大众也可利用一般认知即可做到易于记忆的目的。如原先的“Ayer Rajah Road”与新增的“Ayer Rajah Avenue”、“Ayer Rajah Crescent”和“Ayer Rajah Expressway”或是原先的“Tanjong Rhu Road”与新增的“Tanjong Rhu Place”和“Tanjong Rhu View”等等，也是语文混用结构的系统化表现。

除此之外，尚有以闽南语专名+马来文通名、马来文专名+闽南语专名+英文通名或其他语文专名+马来文通名为混用结构的街名，只占小量的比例。笼统来说，随欧洲同化民的人口比例越加增多，大量出现的杂有英文语汇的混用结构使街名的马来文色彩越显得淡化起来。

三、译名间同音同字或音近同字的规律化

早期的街道中文译名是“就音而译”的形式，就语音层面的发什么音、该怎么读来选词用字。一般只求音读近似，对通译字大多不设其他方面的考量或准则。因此往往是相同的发音单位，即原属同个音节或音位却以不同的汉字来记音；或是不同的发音单位，属各异的音节或音位却以同个汉字来通译。换言之，是街名之间同音异字及异音同字的音译现象，彼此的落差颇大。如：

(一)、同音异字

[aŋ] “Angsana Avenue”（安心道）和“Angus Street”（晏呀街）。

[bê] “Bedok Road”（米多路或吻洛路）、“Jalan Belang”（惹蘭比蘭）和“Belimbing Avenue”（百臨路）。

[jam] “**Bukit Ayam**”（武極亞炎路或武極亞陽路）。

[gi:] “**Changi Road**”（章儀路或漳宜路）。

（二）、异音同字

“巫”——“甘榜亞逸任巫魯”（**Kampong Ayer Gemuruh**）、“惹蘭丁巫殊”（**Jalan Tembusu**）、“甘榜武極巫黎耶”（**Kampong Bukit Berlayer**）或“甘榜雙巫”（**Kampong Sambau**）等。

“魯”——“惹蘭丹戎平組魯”（**Jalan Tanjong Penjuru**）或“羅郎直落古魯”（**Lorong Telok Kurau**）等。

“摩”——“摩拉路”（**Merah Road**）、“惹蘭揸摩”（**Jalan Jamal**）或“摩哈目蘇丹路”（**Mohamed Sultan Road**）等。

诚如第二章中所介绍的一样，这显然是因为缺乏官方力量的硬性划一和从上至下的普及推广，所以没能组织较为系统的审核机构、拟定统一的翻译准则，乃至没有一个街名一种写法或一种发音一个汉字的标准化现象。反之译者单凭自我的发音及自拟的翻译凡例为准，发什么音、选什么字或音与字之间的对应可说没有一个核心准则供与参照，造成显著差异的翻译结果。不仅是译者们彼此之间的落差翻译，甚至是译者自身的翻译也有前后不一的状况，如“**Jalan Besar**”的[bɛ]音节，潘氏在初版译为“惹蘭峇刹”，而再版却译成“惹蘭叻刹”。不单没有音同的对应，更没有音近的联系。

而后期的街名及中文译名在比较全面地审核之下，委员会开始关注音读与译名的规律对应，即同音节同汉字作译的现象。就1970年《新加坡街道指南》中新增的马来文街名及其译名来看，可说是普遍采用了同音同字的翻译形式。如：

音节	通译字	马来文街名	新加坡街道指南
[a:]	亚/阿	Jalan Afifi	惹兰亚菲菲
		Jalan Bahagia	惹兰峇合宜亚（2010年修订为惹兰巴合宜亚）
		Jalan Adat	惹兰阿达
		Jalan Asuhan	惹兰阿素罕
[ba:]	峇/巴	Balam Road	峇南路（2010年修订为巴南路）

		Jalan Bahar	惹兰峇哈 (2010 年修订为惹兰巴哈)
[ji:]	芝	Jalan Uji	惹兰乌芝
		Kranji Road	克兰芝路
[be:] [bɛ]	柏/百	Jalan Bena	惹兰柏娜
		Lorong Bekukong	罗弄柏古岗
		Tembeling Road	登百灵路
		Jalan Besut	惹兰百树
[gam]	甘	Gambir Walk	甘必径
		Jalan Pergam	惹兰柏甘

上述列表中可以发现某些音节对应一个以上的通译字，如音节[be:]就以汉字“柏”及“百”来作译。这与方块文字（汉语拼音或方言拼音）及罗马拼音文字的性质差异有关，即前者是由声母音位、韵母音位及音调音位的元素为表义成份，后者则以元音音位与辅音音位相组而成的表义成份。不论是组合结构或是发音单位都有所差别，因此难以求得二者百分之百的匹配，包括音译形式下确切无误的对应情况。惟有折衷以音近或音似的切入点，保有被译者的基本发音或音位特色来选择音近的通译字，如“柏”及“百”在闽南语的发音分别是[peh7]及[peh8]，与马来文的[bɛ]音节相近而通译；不如早期的“峇”或“吻”，不论是汉语拼音的[bā]及[wěn]或闽南语的[ba1]及[bun3]，都与[bɛ]语音相异。其中的凭音取字仍存有一定程度的规律形式，如下：

通译字	音节	马来文街名	新加坡街道指南
拉	[la]	Bulatan Gudang	武拉丹古丹
	[la:]	Jalan Angin Laut	惹兰安因拉兀
	[ra:]	Flora Road	弗洛拉路 (2010 年新增)
		Jalan Bahtera	惹兰峇特拉 (2010 年修订为巴特拉)
	[rah]	Jalan Cherah	惹兰仄拉 (2010 年被删除)
		Jalan Ikan Merah	惹兰依干美拉
马	[ma]	Jalan Gemala	惹兰哥马拉

		Jalan Jambu Mawar	惹兰占武马哇
	[mah]	Jalan Rumah Tinggi	惹兰鲁马丁宜
		Ramah Street	拉马街
	[mal]	Perumal Road	柏鲁马路
	[mar]	Lorong Chamar	罗弄查马
安	[an]	Angus Street	安格士街
		Jalan Antoi	惹兰安多依
	[am]	Ampang Walk	安邦径
		Jalan Ampas	惹兰安拔士
	[aŋ]	Angklong lane	安克弄巷
		Angsana Road	安莎娜路
雅	[ga:]	Jalan Bunga Raya	惹兰文雅拉耶
		Jalan Penggaga	惹兰本加雅（2010 年被删除）
	[ja:]	Jalan Berjaya	惹兰柏彩雅
		Jalan Yasin	惹兰雅新
	[ia:]	Bedok Ria Road	勿洛丽雅路
		Jalan Mulia	惹兰慕利雅
	[gah]	Jalan Tengah	惹兰登雅
		Telok Blangah Road	直落布兰雅路

当然这还是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不仅是音同字同，而是取音近而字同，较简易与便捷的翻译法。而一系列音同字同或音近字同规律化的音译形式，亦助于社会集体的熟知与记忆。就标准化审核工作之后新增街道的中文译名来看，个中作译的汉字一般只是参照旧有街名中相同音节所对应的通译汉字，几乎只是沿用，没有增加新的通译汉字。除外，后期尚有以语汇为单位的同音同字结构，相同的语汇在不同的街名中皆以一组相同的中文译名来作译。如下例：

语汇	马来文街名	中文译名
----	-------	------

		早期	后期
Bedok	Bedok Road	米多路 叻洛路	勿洛路
	Taman bedok	——	达曼勿洛
Manis	Bukit Manis Road	武極孟尼士路 武吉明尼士路	武吉玛尼士路
	Kampong Ayer Manis	甘榜亞逸孟尼斯	——
	Jalan Manis	——	惹兰玛尼士
Bunga	Kampong Bunga Raya	甘榜挽呀拉耶 甘榜文呀拉耶	——
	Lorong Bunga	——	罗弄文雅
	Jalan Bunga Raya	——	惹兰文雅拉耶
Tiga	Jalan Bintang Tiga	惹蘭酪酞地加	惹兰民当迪卡
	Lengkong Tiga	玲功帝加	麟光迪卡
	Kampong Tiga	甘榜狄加	——
	Jalan Ampas	惹蘭奄北士 惹蘭安拔士 惹蘭奄派士街	惹兰安拔士
	Lorong Ampas	羅郎安巴士 羅郎菴巴士	罗弄安拔士

小结:

马来文街名与译名在标准化审核工作的前与后着实存有些许的变动，总括来说是基于内在发展与外在推力的策应因素。前者就语言经济原则、语言可变性及语言局限性的本质而言，时时处于与在地语言环境的摩擦、冲击与互动关系中，自行调整并在形态或本质上产生新的状况，展现语言积极的动态形式。当反映在街名与译名之间

或个别的语言范畴中，不论是语音形式、书写文字、组合结构或通译模式无不依循语言三大属性的脉络发展。现可稍作归纳如下：

- 一、地域方言向汉语拼音的注音转变、趋简易字字体、更易现代汉语中使用率较低的地域及方言字、或译名之间的规律发展等方向，主要是体现了社会语境下集体认知及记忆效应或新增街名及译名中简易生产的语言经济状况。
- 二、在多元环境中，语言具备包容性与融合性。不仅能合乎主流的语言规范，即向普通话或汉语拼音靠拢，也能产生在地的语言变体，即方言字、地域字或语文混用结构的采用现象。是语言从多语走向结合，形成变异新体的灵活表征。
- 三、中文译名受语音单位或语义色彩的限制，甚至是官方化语言观的局限而在变化的进程中难免出现音讹、缺失或发展不全面之处，像译与被译者的对应问题，不论是雅俗色彩与中立语义的张力、同音同字到音近同字的折衷规律或低使用率字词在新语言政策下的陌生化等，就是语言局限下语音、语汇或语义层面的干扰现象。

后者则是从政治取向及语言计划的外来因素而建构属于在地的语言环境，尽显语言的被动性。从政治理念到语言政策，到社会语言结构的塑造是纵线的层次影响与嬗变关键，凸现语言态度存在的历时差异。就 1970 年前、后两期的街名及其对应的中文译名来看，或是语音从方言到汉语拼音的转变，或是求依据普通话的规范而去地域字及方言字的陌生，或是繁体字到标准简体字采用，或是混用结构中英文专名或通名的普遍采用等等，都是官方在政治争执中实施的务实政策，乃至务实的支配语言。

第五章：结语

第一节：21 世纪官方街名与中文译名的趋势推测

自治独立前后迄今，从功利的建交关系到务实的语言教育，官方所秉持的语言态度都以实用价值为转移。像早期移民社群的地域方言、独立前后母语教育的争取，兼及学习共同语（马来语）的身份认同、脱离马来亚联邦“英语为主”的双语政策、与中国友好建交的“讲华语运动”等，都是不同时期政府推出的语言方针政策，以此打造出一整套理念中的社会语言。当体现在马来文街名与中文译名的语言翻译时，早期至后期的历时变化无不与官方化的语言观是一致贯彻的。纵观 1970 年之后马来文街名大量地被删除，语文混用结构却相对在增加，尤其是英、巫语汇的混用情况越加普及化。像近几年新增的“Tukang Innovation Grove”、“Tukang Innovation Drive”和“Jalan Noordin”等街名或为数不少的“英文专名（Upper、New 与 Old）+马来文专名+英文通名”新结构正说明官方对马来文采取偏离，转对英文靠拢的态度表现。甚至是中文译名从方言到汉语拼音的注音转变、简易字使用的趋势、去地域字或方言字等都是某阶段受支配语言影响的分化物。

不论是地名、街名或地铁站名的华文译名，其标准化的审核工作皆由文化部“华文译名统一委员会”负责，而共同的决策单位、准则或意识态度也就决定了三者的命名或译名制定并非是“二元”的，反之处于相互参照或取用的关系上。即是说，或许能从新启用或拟建中的地铁站名着手，推测新街名与中文译名在他日的可能趋势。[见附录(四)：表 4。]

一、英文为名的现象。以 2010 年刚启用的市区环线为例，总共 20 个站名中，英文称谓就占了 15 个之多。

二、英文为名者多以意译，而马来文为名者多以音译来通译。

三、译名字词的文雅化。就“Bras Basah”（百胜）而言，纯然是出自“说吉是吉”，趋雅避俗的文化心理，以致异于旧有地名或街名音译的“勿拉士峇沙路”，也不切合意译形式。

四、译名间的规律沿用。如“Pasir Panjang”（巴西班让）或“Farrer Road”（花拉

路)，相同语汇的站名、地名或街名，皆以一组相同的中文译名来作译。

五、多元语文的命名结构。大致可区分英文命名、马来文命名、闽南方音或其他语文命名和语文混用命名四大类，又以英文命名为多数。其中，英文称谓多是新创（Beauty World 美世界、King Albert Park 阿尔柏王国）、马来文称谓多是旧有命名的沿用（Pasir Panjang 巴西班让、Telok Blangah 直落布兰雅）、闽南方音或其他语文称谓多是人名命名（Sam Kee 三记、Teck Lee 德利），而混用结构多是英文语汇与其他语文组合而成（Bukit Brown 武吉布朗、Haw Par Villa 虎豹别墅）。

值得省思的是，区区六十个年的发展，一变再变的语文政策，不仅无利于语文能力的扎实掌握、对语言认同的两极态度，更涉及文化层面，对本族与他族或建立一族关系的族群认同造成离散心理。就马来文街名中多数的音译结构，而英文街名中不少的意译比例相较来看，可说是委员会，乃至语言制度下广大的社会群体对马来语文的普遍认知，图存音的辨识，缺失义的理解。换言之，马来文街名只为官方化称谓的实用价值，或是书写多元族群与多语社会的其一工具，而语文内涵或文化意义的定位则逐步被模糊。诚如李资政所言：“一个民族的形成可能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但是，使不同种族的人说一种语言，在一代里可以办得到”¹，当一个政府旨在打造顺应时代变迁与政治争执的共通语时，最容易忽略的事实是语言具有世纪价值，承载着族群之间的凝聚力、历史记忆的恒久性、国家意识的架构和文化遗产的理据意义等。或许在肯定务实政治或实用利益之际，同步省思任何语文的本质功能文化力量，才是名符其实的母语教育。否则双语政策下族群根源或文化价值观的逐步消失，而力图挽救母语体系的困扰，将一直是政府与国人患得患失的焦虑。

第二节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兹列如下：

一、基于时间短促，此论文只能将研究范围局限在几个年段的街名录来进行对比及总结，对其他年段的街名及译名现象或个中变化可能有所忽略。

¹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1993），页 364。

二、依据研究范围所归纳出来的马来文街名约有千多条，数量庞大。因此笔者只能概括地分析及归纳，或必会有缺失或是不足全面。

三、基于资料有限，笔者的归纳只是大体的概括，并非所有街名及译名都依循此演变现象。对于没能解决的特殊结构，只能推测可能是街名数量过于庞大，委员会在审核过程中所出现的漏失；或可能是不同时期标准的侧重有所差异，因此审核结果也有所不一；甚至是一方面想保留最原本的译名，一方面又受准则制约，不得不出现的矛盾。

四、笔者多次致函询问或要求访谈，有关部门一概不予理会。因此无法取得最直接或更丰富的资料。

笔者盼能做到抛砖引玉，延伸为其他相关的研究。列举几项，供与参考：

一、对于其他语文中官方街名及中文译名，或许能依循本研究的探讨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语言特色或是时期性的演变趋势。

二、作比不同语文中官方街名及中文译名的语言现象或是时期性的语言演变趋势。

三、以标准化街道中文译名委员会所拟定的准则为脚本，就马来文街名及中文译名或其他语文及中文译名的特殊结构或缺失之处的归纳及因素分析，深入探讨笔者没能解决的问题。

四、以不同年龄层、不同语言背景、不同职业阶层、不同种族群体等因变量为切入，探讨社会对官方街名及中文译名的务实性或传统性所投以的语言态度。

附录（一）

表 1、新加坡马来文地名的地理分布区

分布区	马来文地名与中文译名
东端兼南端	武吉士 (Bugis)、阿裕尼 (Aljunied)、加冷 (Kallang)、巴耶利巴 (Paya Lebar)、友诺士 (Eunos)、勿洛 (Bedok)、芽笼 (Geylang Serai)、芽笼 (Geylang)、丹戎加东 (Tanjong Katong)、直落古楼 (Telok Kurau)、实乞纳 (Siglap)、丹那美拉 (Tanah Merah)、樟宜 (Changi) 等等。
东端	实里达 (Seletar)、实龙岗 (Serangoon)、巴西立 (Pasir Ris)、榜鹅 (Punggol) 等等。
南端	巴西班让 (Pasir Panjang)、丹戎百葛 (Tanjong Pagar)、红山 (Bukit Merah)、巴西拉巴 (Pasir Laba)、直落布兰雅 (Telok Blangah) 等等。

图 1: 新加坡地理分布图¹



¹ 见网页 <http://www3.ntu.edu.sg/home/Norlisa/map.html>。（2010年9月10日）

附录（二）

表 2、音位注音的用字修订（从《东南亚地名街名录》及《星马通鉴》到《新加坡街道指南》[1970-2010]）

马来文街名	东南亚地名 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 南 1970-2010	备注
Bukit Manis Road	武極孟[biŋ6] 尼士路	武吉明[biŋ2] 尼士路	武吉玛[mǎ]尼 士路	将元音[i]修订为 [a]音位；辅音[b] 修订为[m]音位。
Hamid Lane	哈默[bik8]巷	哈默[bik8]巷	哈密[mì]巷	将辅音[b]修订为 [m]音位。
Jalan Anggerek	惹蘭安基 [ki1]立	惹蘭安加 [ka16]力	惹兰安格[gé]烈	将元音[i]、[a]修 订为[e]音位。
Jalan Gumilang	——	——	惹兰甘[gān]米 郎，2010 修订 为惹兰古[gǔ]米 郎	将元音[a]修订为 [u]音位。
Jalan Jermin	惹蘭芝孟 [biŋ6]	惹蘭者明 [biŋ2]	惹兰芝敏[mǐn]	将辅音[b]修订为 [m]音位。
Jalan Kledek	惹蘭乞例利 [li65]	惹蘭乞例利 [li65]街	惹兰克列狄[dí]	将辅音[l]修订为 [d]音位。
Jalan Ladang	惹蘭拉丹 [tan1]	惹蘭拉丹 [tan1]街	惹兰拉当[dǎŋ]	将辅音[n]修订为 [ŋ]音位。
Jalan Laut	惹蘭拉律 [lut8]	惹蘭羅特[tik8] 街	惹兰拉兀[ù]	修订为零声母， 并将元音[i]修订为 [u]音位。

Jalan Sempadan	惹蘭新 [sin16]巴丹	惹蘭新[sin16] 巴丹街	惹兰森[sě̃n]巴 丹	将元音[i]修订为 [e]音位。
Jalan Senang	惹蘭新 [sin16]南	惹蘭新[sin16] 南街	惹兰申[shē̃n]南	将元音[i]修订为 [e]音位。
Kempas Road	敬[kin̩5]巴士 路	敬[kin̩5]巴士 路	肯[kě̃n]巴士路	将元音[i]修订为 [e]音位。
Jalan Daud	惹蘭道[to6] 德[tik7]	惹蘭道[to6]德 [tik7]街	惹兰达[dá]兀[ù]	道：将元音[o]修 订为[a]音位。 德：修订为零声 母，并将元音[i]修 订为[u]音位。

附录（三）

表 3、2010 年街道译名的通译汉字

阿	博	洞	瓜	旧	丽	茂	奴	绍	汀	雅	祯
艾	卜	都	关	卡	利	美	努	舍	亭	亚	芝
安	布	督	国	开	列	萌	诺	申	哇	炎	知
庵	步	笃	果	柯	烈	猛	排	生	瓦	央	直
岸	才	杜	哈	克	邻	蒙	派	圣	挽	耶	朱
奥	彩	敦	海	峇	林	孟	蓬	诗	碗	业	茱
巴	查	顿	韩	肯	临	米	平	石	万	依	株
芭	茶	多	罕	昆	琳	民	坡	实	旺	宜	珠
拔	昌	鹅	汉	拉	麟	敏	普	史	威	易	竹
百	超	恩	豪	腊	灵	明	奇	士	维	益	祝
柏	车	尔	禾	莱	玲	摩	乞	梳	温	逸	爪
班	赤	法	合	兰	令	末	乔	树	文	因	佐
板	楚	菲	和	蓝	龙	莫	清	双	汶	茵	
邦	慈	夫	河	郎	笼	默	让	水	翁	荫	
榜	达	弗	胡	廊	隆	木	惹	顺	乌	永	
宝	答	芙	华	朗	楼	慕	仁	司	武	由	
堡	打	干	环	浪	鲁	拿	日	思	兀	友	
贝	丹	甘	基	劳	律	那	戎	斯	勿	禹	
贲	淡	岗	及	老	罗	纳	容	四	务	育	
本	当	高	吉	乐	洛	娜	蓉	宋	西	裕	
比	德	告	济	叻	落	乃	润	颂	希	泽	
必	登	哥	加	勒	马	奈	萨	苏	溪	仄	
庇	狄	格	佳	雷	玛	耐	赛	素	锡	詹	

碧	迪	葛	家	冷	吗	南	三	索	洗	占	
壁	地	更	嘉	厘	迈	闹	桑	太	欣	章	
宾	蒂	公	甲	莉	麦	尼	色	泰	新	彰	
滨	爹	贡	江	礼	曼	涅	森	汤	信	樟	
丙	丁	姑	杰	里	芒	宁	沙	淘	星	照	
秉	定	古	捷	力	毛	农	刹	特	牙	珍	
波	东	固	景	立	茅	弄	莎	提	芽	真	

附录（四）

表 4、21 世纪新启用或拟建中的地铁站名

新启用				
地铁列车线	英文地铁站名	马来文 地铁站名	闽南方音 或其他语文 地铁站名	语文混用 地铁站名
市区环线	Esplanade 滨海中心 Promenade 宝门廊 Nicoll Highway 尼诰大道 Stadium 体育场 MountBatten 蒙巴登 Dakota 达科达 Macpherson 麦波申 Bartley 巴特礼 Marymount 玛丽蒙 Botanic Garden 植物园 Farrer Road 花拉路 Holland Village 荷兰村 One-North 纬壹 Kent Ridge 肯特岗 Labrador Park 拉柏多公园	Bras Basah 百胜 Pasir Panjang 巴西班让 Telok Blangah 直落布兰雅	Tai Seng 大成	Lorong Chuan 罗弄泉
圣淘沙轻轨 快车	Waterfront 水滨 Beach 美芝	Sentosa 圣淘沙 Imbiah	——	——

		音庇亚		
拟建中				
地铁列车线	英文地铁站名	马来文 地铁站名	闽南方音 或其他语文 地铁站名	语文混用 地铁站名
榜鹅西轻轨 线	——	Nibong 尼蒙 Sumang 苏芒	Sam Kee 三记 Teck Lee 德利 Samudera 山姆 Soo Teck 树德	Punggol Point 榜鹅坊
市区环线	Caldecott 加利谷	——	——	Bukit Brown 武吉布朗 Haw Par Villa 虎豹别墅
市区延线	Cashew 凯秀 Hillview 山景 Beauty World 美世界 King Albert Park 阿尔柏王国 Sixth Ave 第六道 Stevens 史蒂芬 Bayfront 海湾 Downtown 市中心	Telok Ayer 直落亚逸 Rochor 梧槽	Tan Kah Kee 陈嘉庚	——
南北地铁线	Canberra 坎贝拉	Sungai Kadut 双溪加株	——	——
东北地铁线	Woodleigh 兀里	——	——	——

参考书目

单篇论文:

1. 姜道章《新加坡之华文地名》，见《南洋大学学报》，第2期（1968），页71。
2. 肃明《新加坡街道的华人名称》，见《南洋文摘》，第1卷，第11期（1960），页60。
3. 叶勤生《星洲通俗地名街名起源》，见《南洋文摘》，第10卷，第11期（1969），页750。

学位论文:

1. 冯玉珊《论早期新加坡街道华文俗名的语言与文化特点》，（新加坡：新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论文），2004）。
2. 冯玉珊《早期新加坡街道华文俗名的风格与修辞研究》，（新加坡：新跃大学（硕士班论文），2005）。

专著:

1. 方显编著《星马史》，（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0）。
2. 哈弗·皮尔逊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小组译《新加坡通俗史》，（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
3. 韩山元《从大坡到小坡——新加坡市区掌故》，（新加坡：八方文化，2004）。
4. 黄尧《星·马华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会及马来西亚黄氏联合总会联合出版，2003）。
5. 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6. 李王晶莹《阅读·探索》，（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8）。
7. 李卫国编辑《新加坡历史图片集 1819-1945》，（新加坡：星洲日报[新加坡]有限公司，1981）。

8. 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3）。
9. 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罗兰·巴尔特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 区如柏，《寸寸乡土情》，（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11. 潘醒农编著《东南亚地名街名录》，（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2及1959）。
12. 清李钟钰《新加坡风土志》，（新加坡：南洋书局有限公司，1947）。
13. 邱新民编著《新加坡寻根》，（新加坡：章金福，1983）。
14. 世界书局编《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1959）。
15. 王振春《记忆里的小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
16. 王振春《石叻老街》，（新加坡：胜友书局，1997）。
17. 《巫来油通话》，（新加坡：永成书庄，1939）。
18. 吴彦鸿《新加坡街名由来》，（新加坡：宏砚工作厅，2006及2008）。
19. 吴彦鸿《新加坡风土志》，（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7）。
20. 吴元华《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 1954. 1965》，（新加坡：联邦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99）。
21. 《新加坡街道指南》（新加坡：迈迪脉思出版社，1990及2010）。
22.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1993）。
23. 《新加坡指南：附英华对照街道索引》，（新加坡：文化部，1970）。
24. 许永顺《记得，大坡牛车水》，（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厅，2002）。
25. 许永顺，《新马街名地名探索》，（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厅，2009）。
26. 许云樵编著《南洋华语俚俗辞典》，（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61）。
27. 许云樵《马来亚丛谈》，（新加坡：青年书局，1961）。
28. 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6）。
29. 郑文辉《新加坡赤道小红点》，（新加坡：蓝点图书私人有限公司，2009）。

报刊文章:

1. 亚里《新加坡的街名》，《星洲日报》（新加坡）1956年1月30日。
2. 本地姜《本坡街名今昔称》，《星洲日报》（新加坡），1950年10月23日。
3. 本地姜《新加坡街名沿革考》，《星洲日报》（新加坡），1954年4月27日。
4. 蔡孝欣《新街道命名更重视历史》、《新镇街名从何来？》，《联合早报》（新加坡），2003年5月16日。
5. 林道生《（小坡）七条马路的故事》，见《新明日报. 新专题》（新加坡），2003年7月21日。
6. 莫美颜《缅甸古都江河名留摩绵、摩绵区有15缅甸名街道》，《联合早报. 现在》（新加坡），2002年5月21日。
7. 谢燕燕《穿街走巷、大小通‘知’、全岛2400多条路、街名背后有趣事》，《新明日报》（新加坡），2006年8月19日。
8. 谢燕燕《大诗人比比街是》，《新明日报》（新加坡），2006年8月24日。

网上地图:

1. 见网页 <http://www3.ntu.edu.sg/home/Norlisa/map.html>。（2010年9月10日）

Journal Articles:

1. H.T. Haughton, "Native Names of Street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06 (1891).

Books:

1. Buckley C.B, *An Anecdoted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2. Savage, Victor.R & Brenda S.A. Yeoh,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3. Singapore. Committee on Standardized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treet Names,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Standardisation of Street Names in Chinese,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1970).